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素质教育文库
艰难时世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艰难时世

致家长和老师

小时候，我最喜欢看的书是关于武侠和知识青年生活的。这些书只要一拿起来就舍不得放下，总是躲在被子里偷偷地看到很晚。武侠的豪气干云、知青逆境中萌发的真爱，不时会激动着我那颗小小的心。

长大了，虽然常常自愧做人远没有江湖人的那份洒脱不羁，对知青的崇敬却始终保留着。以至于每当我直接或间接地得知某位当年的知青，在走过了那么多贫穷和苦难的日子以后，终于实现了个人的理想时，便会替人家激动不已，那情形仿佛是自己忽然成了暴发户或是摘取了某项耀眼的桂冠一样。

也许是因为对知青的偏爱，所以也就特别注意他们的孩子，一代正在成长中的孩子。这一代孩子比起他们的父辈来，不知道有多幸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对他们百般呵护，为人父母的当年知青对他们更是宠爱有加。也许是自己吃的苦、受的难太多太多，当年的知青们仿佛不能忍受自己的亲生骨肉再受半点委屈，再有丝毫的不如意。

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年代成全了他们。他们的孩子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成了集各方娇宠于一身的中国当代小皇帝。

孩子们的幸运还不止于此。社会的进步，使孩子越来越聪明伶俐、讨人喜欢。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更使他们的小脑袋瓜里装满了各式各样新鲜的词汇，偶尔蹦出一句话来，就连做家长做老师的也要愣半天才能回过神来。这些孩子对新事物接受能力之强、对新东西反应之迅速，远不是他们的父辈当年所能比拟的。

然而，也许世上的事本来就难以十全十美。当孩子们在家长的呵护和周围人的一片赞誉声中成长起来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却很难再找到他们的父辈当年所具有的那种精神。

当年的知青如今虽是倾其所有使孩子过得悠闲自在，但他们或是忙于自己的事业，恨不得一天当成两天用，要把过去的损失弥补回来，没有时间坐下来与孩子沟通交流；或是感叹自己已是“过去时”，而把全部梦想、全部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替自己扬眉吐气、出人头地。望子成龙心切，使自己无暇顾及孩子的所思所想，孩子学习好了，就一味地娇宠溺爱，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做保姆，孩子学习不好，又一味地施加压力，使孩子自卑得抬不起头来。

在学校，老师、学生统统围着“升学率”转，只要学习好，就一好百好。思想政治课上，没有思想，只剩下对付各类考试的政治。历史课上，国内国外历朝历代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哪一个也不能拉下，本就是走马观花一带而过，为了应付升学率，就更是只捡一些有可能被考的条条框框重点讲上一讲，隐含在史实背后的人类的精神伟力和坎坷命运只好忽略不计了。

孩子们吃不了苦、受不得委屈，有的孩子稍有不如意就会离家出走，甚至小小年纪也学会轻生，这确实不能不说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一个误区。

我希望这一代孩子一生平安、快乐、如意，同时也希望有人能教给他们在遇到一些沟沟坎坎、乃至社会大的动荡时，如何迅速地调整自己，勇敢而自信地去面对。为此，当接到《艰难时世》这个题目时，尽管压力很大，我还是拿起笔来，希望能让孩子们了解，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那些动荡的年代，

人们是怎样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斗争和生存下去的。

在书中，孩子们不仅会看到先驱者是如何不屈不挠地执着追求自己的信念，平凡的人是如何忍辱负重满怀希望地与命运抗争，而且将会看到在动荡中人们是如何把握机遇，在极度恶劣的环境里人们又是如何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的。

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天之骄子，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取得骄人的成就，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每个人也都曾经为之奋斗过。失败并不能否定努力，理想能否实现有时真的是由命运来决定的。

《艰难时世》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个重温的过程。没想到，再次阅读有关资料，自己还会为书中的人与事所激动，就像儿时一样。我在自己的文章里，没有做过多的主观评论，我只是希望把那些让我个人深受感动的东西写给大家。如果孩子们像我一样地被感动了，那么我相信他自会从中有所领悟，获得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西南联大

八千里路云和月

1937年7月底，平津失守，北方各大高校被迫纷纷南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奉命迁至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作为联合大学的常务委员，主持校务。学校下设文、法、理、工四个学院，其中除文学院设于南岳外，其余学院全部留在长沙。到11月，各学院基本准备就绪，纷纷开始上课。1937年底，南京沦陷，临时大学匆匆结束了它不到一个学期的教学工作，再次准备迁徙。此次的目的地是后方重镇昆明，一座春城。

1938年2月，临时大学除部分同学投笔从戎、北上抗日救亡外，其余分成两路，开始搬迁。一路由教师、女生和部分体弱男生组成，乘火车取道香港、越南赴滇。另一路就是轰动一时、经贵阳等地徒步入滇的湘黔滇旅行团了。

一提起旅行团，总让人想起小时候所唱的“我们是快乐的旅行队”这首歌，而旅行团的成员到底快乐与否，大概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了。

旅行团采取战时军事组织形式，团长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先生亲自挑选的中将参议黄师岳。出发前，旅行团在韭菜园校本部的大草坪上举行了“誓师”大会。会上，团员们一律穿着新配给的制服和帽子，个个精神抖擞，宛若即将开赴前线，阵容甚为壮观。

一路上，团员们清晨即起，早餐甫毕，立即开拔。每日少则二三十公里、多则四五十公里。夜晚多以稻草为席，间或也与鸡鸭犬豕同室而眠。沿途还坚持作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一路行来，趣事多多、收获多多。

湘西土匪素来猖獗，除非万不得已，极少有人愿意涉足此地。幸好张治中先生提早跟“湘西王”打了招呼说，有一批穷大学生将“借道”从这里去云南读书，旅行团因此得以悄然平安通过。尽管有一晚还是听到了几声枪响、受了几许虚惊，但团员们还是很以此事为荣。

旅行团也有很风光的日子。路过贵州省的时候大学生们极受尊敬，有的县甚至派出中学生在城郊列队欢迎。当地群众更是沿路争相观看，有一对郑姓姐妹还特地邀请一位同姓的团员到家里吃饭认亲，并赠送玉箫一对留作纪念。热烈的场景在省城贵阳达到了高潮。这一天正赶上大雨滂沱，旅行团成员们为壮观瞻，歌声嘹亮、步伐整齐地冒雨行军，大街两旁的群众无不鼓掌雀跃。

旅行团居然还遭到过别人的嫉妒。他们一入云南便撞上了正向外开拔的滇军六十军。滇军们眼看着旅行团阵容整齐、士气旺盛，而且还个个穿了崭新的制服，不由得醋劲大发，愤愤地骂将起来：“他妈的！我们步兵正在开往前线去打仗，他们‘航空兵’却躲来后方享福！”原来他们把旅行团错认为是航空部队了。

旅行团除去完成每天规定的步行任务，还忙里偷闲顺路欣赏了桃花源、飞云岩等祖国大好河山，访问了侗家村落和苗民彝民的山寨。不仅熟悉了各地风土人情，而且亲手采集了无数稀有的动植物标本。收获最大的当数歌谣采访组的刘兆吉。他一路上不辞辛苦搜集了2000多首歌谣，后来整理成册，出版为《西南采风录》，真正实践了闻一多先生的著名理论：“有价值的诗

歌，不一定在书本上，好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希望大家到民间去找。”

师生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历时 68 天，行程 1600 里，于 4 月 28 日“精神旺盛”地在昆明与先期到达的队伍胜利会师了。

此时，旅行团的成员人人都脱了一层皮，唯独闻一多先生的胡子一路上日日见长，至此已成了好大一副美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此次搬家，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我和冯芝生的最美。”冯芝生就是冯友兰先生。冯先生赴滇途中手臂折断，动作不便，因而留了胡子。他也很为自己的胡子长得快且美而骄傲，时常“一袭长衫，半部黑髯，飘然而行”。这大概可以算是教授们的收获吧。

炮声·雨声·读书声

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昆明与蒙自的关系，被联大学生戏称为前者如北平、后者如海淀，只不过从“北平”到“海淀”需一天的车程。有时候火车晚点，还要在中途过上一夜。后来有许多家眷迁来昆明，在蒙自教书的教授们便开始于两地之间频繁地奔走。5 月 4 日，联大正式开课。

受条件限制，不仅学院分作两地，联大学生的教室也相距甚远，都是七拼八凑借来的房子，分散在好几处。听课的学生每天东奔西跑，换教室、抢座位，忙碌于众教室之间。

教室多为土墙泥地草皮顶（也有部分铁皮顶）的低矮平房。教室里的课桌大部分也是由土基搭上木板拼凑而成的。教室的破旧程度从杨振宁博士的回忆中可略见一斑：“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宿舍的情况更糟。不仅没有书桌，简直连条宽裕点的缝隙也找不到，即使是一间很小的茅草屋，里面也要挤住上 40 多人。清一色的上下铺，拥挤如客轮的三等舱。在没有图书馆和教室可去的时候，一切活动便都在床上进行：躺在床上就着枕头写家信，坐在床上支起双膝垫上个硬家伙抄笔记，当然也有挤在一两张床上打桥牌、下象棋、大唱各种歌曲的时候。流亡学生不以为苦，反为这难得的亲密无间感到其乐融融。

雨季是最滑稽的时候，宿舍和图书馆总是屋外下雨屋内漏。于是无论睡觉还是看书，必定人人头顶一把伞。

除了头顶的雨水声，联大学生最熟悉的来自空中的声音便是警报声和炮声了。在屡遭日寇飞机轰炸的那段日子里，昆明上空飞机往返回旋、清晰可辨。学生的上课时间被迫改在上午 7 点至 10 点，下午 3 点至 6 点。每次课间休息缩短为 5 分钟。无论上课与否，一有警报，立即疏散。

敌机的轰炸使联大不多的家当再次被毁。1941 年入校的新生被分配在破败的庙宇里，守着泥菩萨生活学习了半年有余。

贯穿于此起彼伏的炮声、雨声之中的，是联大学生那经久不衰的读书声，那是一种唯一永恒的旋律。

从 1938 年到 1946 年，每天都在上演着联大学生上前乱哄哄挤在一起争抢座位的喜剧。图书馆里拥挤而肃穆的景象也周而复始一天真实地存在着。

联大学生的生活水平和环境一日日地降低和恶化下去，而学生们的思想和神经却是一日日地丰满和兴奋起来。地方虽小，然而云集了全国无数知名教授。联大学生从大学一年级起就可以聆听教授们深入浅出的讲解，接受他们春风化雨般的指导。仅只《中国通史》一门课，学生们就可以接触到吴晗先生系统性极强、以制度演变史为主的“纵法”讲授和雷海宇先生故事性极强、以历史循环论为主的“横法”讲授，此外，还有钱穆先生、孙毓棠先生……学生们可以任意去听，不论系别、院别。设备、教材固然简陋，却大大培养了联大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联大对学生的质量是严格把关的。如果全年有三分之一的课程不及格，就要留级，如果全年一半功课不及格，就要退学。不仅对专业课严，对文史、体育等基础课程也要求甚严。一天，有位学生在报送选课单时填了一门“国济贸易”，经济学系主任陈岱孙教授指着“济”字说：“改一改”。学生马上将“济”字改写为“暨”，仍是一个错别字！陈先生于是红笔一挥，划掉“国济贸易”，替他填上了一门3学分的“大一国文”。

在严师如此仔细的敦促下，联大学生个个勤奋用功，不敢有丝毫偷懒懈怠。

八年过去了，二千多名学生在炮声、雨声、读书声的合鸣中走出了联大校门。日后成为蜚声国际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博士亦在其中。

国难当头讲《孟子》

罗庸先生素以声音洪亮著称、讲起课来跌宕起伏、收放自如，别号“罗叫天”。

叫座的罗先生，到了蒙自更是独树一帜，开了《孟子》和《杜诗》两门课。罗先生往讲台上一站，开宗明义就说：“国难当头，读《孟子》是为弘扬士气，养成坚韧不拔的意志，负起多难兴邦的重任；读《杜诗》，就要充分体会贯穿在他诗里的忧国忧民的精神。杜甫一生颠沛流离，但从不把个人的疾苦置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疾苦之上来看待。”台下学生，无不为之振。

事实上，在联大，罗先生哪里是用嘴在讲《孟子》和《杜诗》，又哪里是罗庸先生一人在讲《孟》《杜》，众教授无不在用自己的行为给联大学生上着生动的一课。

学校奉命南迁之后，联大教师顾不上与年事已高的双亲多作话别，抛舍下柔弱妻儿，便先后南来。战火纷飞的年代，其牵肠挂肚之情可以想见。

南下以后，学生们挤挤挨挨住茅草屋，教授们又何尝舒舒服服地住过洋楼公寓。床铺不过是由三块板二条长凳拼铺而成。如能侥幸以国币一角一只购得几只洋油木箱用来作床铺，便很是满足。卫生间是与学生们公用的，“前后两排，晨夕川流不息，即挤且秽”。想来多少有点于师道尊严不符。

困难的时候，学生们吃由霉米加百分之十谷子、稗子、砂子、泥巴等物做成的“八宝饭”，而教授们有的一家靠食粥度日，如果还吃上了菠菜汤，就很是高兴。吴大猷教授常常穿着大补丁裤子去上课，曾昭伦教授的鞋子也总是前后见天。

尽管如此，教授们依然故我，兢兢业业地讲课、踏踏实实地做学问。魏建功先生教授《汉字形体变迁史》，往往自刻蜡版印发学生。他所刻的蜡版，

因字体繁多、笔划有粗有细而颇费眼力和手力，但每每总会及时地发放出来。钱穆先生教授《中国通史》，即使是在空袭频繁的日子，钱先生每次“结队避空袭”也不忘“携《通史随笔》数册”，为的是能给第二天的课程作准备。陈寅恪先生教授《佛教翻译文学》，他和燕卜荪先生一样博闻强记，可以整段整段地背诵佛经，不过他还是喜欢不辞辛苦地把一大摞佛典搬来运去。冬天的时候，他会把两顶瓜皮帽叠起来戴，拎着用麻绳捆扎、塞得满满的提包，缓步当车，往来于宿舍与课堂之间。上课的时候，高度近视的陈先生会把两行字叠在一起写，好在他一边写，一边还要口述。讲到得意之处，他会仰面哈哈大笑，忘了身在何处。

操场上、树荫下，不时可以看到教授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也有喜欢到民间去搜集文献古籍的、调查民风民俗的。罗常培先生和王力先生就曾利用当地条件，因地制宜地开辟了新的教学和研究领地——《汉藏预言调查》、《汉越语研究》等。当然还有如“何妨一下楼主人”闻一多先生那样，除了去上课，便把自己关在屋里埋头用功的。

八年间，西南联大不仅没有因为时局的动荡、物质的匮乏而变成一个怨天尤人的集中营，反而凭着教师们“刚毅坚卓”的精神结出了累累硕果：理学院华罗庚、周培源的研究成果分别获教育部第一、二届学术审议会自然科学类一等奖，工学院出版教科书八种，文法学院的教授们出版专著十数部。各学院还根据个人研究所得增设了如《流体力学》、《植物解剖学》等数门质量上乘的新课程。

更为重要的是联大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在战火纷飞中延续了中华文明的遗脉。投笔从戎、血洒疆场是捍卫国家，而坚忍不拔、文化兴国也未尝不是一种力量的抗衡。国难当中，联大教授功不可没。

学生亦老师

联大的学生在众教授面前是懵懂无知的乖乖学生，可是在当地人眼里，他们就变得很神圣、很高大了：知识很渊博了还是那么用功读书，又爱国、又讲卫生，还时髦还开化还不摆架子。于是学生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乃至衣着打扮均开风气之先，而且被人亦步亦趋地仿效着。学生们自觉不自觉地俨然有了一副为人师表的风范。

学生们首先教给人们的是：穷苦人并不低人一等，智力也并不比谁低下。只要勤奋用功，同样可以考上大学。

学生们一到蒙自，便使蒙自人十分“失望”：从火车上下来的，不是他们想象中西服革履、浓妆艳抹的少爷小姐。要不是从口音、眼镜和举止分辨，混在人群里还真看不出哪些才是大学生。学生们一下火车就七手八脚你帮我、我帮你地把行李搬了个八九不离十，第二天，也不见学生们吆三喝四地下馆子、四处玩耍，反而一大清早就人人捧着本书、守着南湖用起功来。

一头雾水的老乡四处一打听，原来大学生并不都是富裕人家的子弟。“茅塞顿开”的蒙自人自此努力读书的多了起来，特别是女孩子上学的多了起来。

学生给蒙自人上的第二课是爱国卫生运动课。蒙自盛产苍蝇，俗称“饭蚊子”。饭菜一经上桌，便有“饭蚊子”成群结队前来“献舞”，而且赶之不尽、挥之不绝。人走在街上，被“饭蚊子”们碰上几下鼻子和嘴也是常有的事儿。当地人见怪不怪，颇能与之和平共处。学生老师初来乍到，忍无可

忍，于是拍案而起，联合当地驻军和其他部门开了个灭蝇动员大会。会上，学生们颇有一点圣雄甘地每见人随地吐痰便奔过去宣讲一番大道理那样苦口婆心的架势。会后，蒙自几乎人手一蝇拍，对“饭蚊子”进行各个击破。

苍蝇并未就此灭绝，不过蒙自人自此知道了苍蝇乃传染疾病之媒介，是蒙自人常常发生腹泻、霍乱的罪魁祸首。

第三课是由女学生主讲的。蒙自是一座闭塞的小镇，素有“世外桃源”之美称。“世外桃源”中的妇女长裙及地、长袖及腕，无论冬夏。新娘子上街必打“遮羞伞”，青年男女上街不得并肩而行。

联大学生一来，小镇古风日渐不古。女学生的出现不仅使蒙自女孩子上学的多将起来，而且使她们日渐时髦起来。原来“远望女学生一队队，孰为联大学生，孰为蒙自学生，衣装迥异，一望可辨”。可没过多久，就满眼“尽是联大学生，更不见蒙自学生。盖衣装尽一色矣”。“联大学生自北平来，本皆穿袜。但过香港，乃尽露双腿。蒙自女生亦效之。赤足纳双履中”。蒙自女生的衣袖自然也是越改越短，“以致胳膊上显出几节深浅分明的肤色”来。

联大学生还真的正正经经地作过一回老师。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独挑大梁，为蒙自失学人员开办了夜校。报名者如过江之鲫，有儿童也有成人。一起学语文、音乐和算术。讲语文的时候，学生老师还会讲讲时事，宣传抗日思想，指导学生们给自家编写抗日门联。音乐课上则教唱抗日歌曲。于是，一时间蒙自家家门上张贴抗日对联，街头巷尾处处传唱救亡歌曲。

联大学生离开蒙自的时候，蒙自人怀着别样的心情再次纷纷涌向火车站。其中有一位跛脚的夜校学生，在车厢外一拐一拐地跑来跑去，和车厢内的学生老师一一握手告别，泪流满面。

背影

读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是会不知不觉间潮湿了眼眶的。文中虽然没有任何华丽的词藻，但父亲那捧着橘子攀爬月台的胖胖的身影会令人经年不能忘怀。

朱自清先生人如其文。没有任何张扬、张狂，他就那么恬静沉稳地呆在那里，但又让人无时无刻不感觉到他的存在。

学生初来蒙自，朱先生每每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嘘寒问暖、细心照料。学生毕业离开蒙自，朱先生又亲自到车站送行，叮咛嘱咐。火车都开走很远了，还隐约可见“站在月台上的朱自清先生高举着的礼帽影儿，在远空中摇荡”。1938年7月底，文法学院开始分批迁回昆明，这个时候，又是朱先生亲自张罗搬迁事宜。“他陪同大家到碧色寨，安排我们上车坐定。车启动时，他站在站台上向我们招手微笑，然后转回蒙自去安排下一批。”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想着他连日来的操劳辛苦，学生们眼前的朱自清先生仿佛变成了《背影》中的父亲。

朱先生在写《背影》一文的时候，大概怎么也想象不到自己会成为学生们心目中那永恒的“背影”吧。

朱先生对学生的关爱不仅是在生活上，更是在学业上。联大“南湖诗社”成立时，他欣然应邀担当指导。对于一个学生自发创立的小团体来说，这样一位大诗人的参与本身大概比他的任何具体指点都更令人为之雀跃吧。对于

诗社以外的人，如果谁写了好诗，被他知道了，他也会主动把人家找上门来，点拨一二。

朱先生还积极鼓励同学们举办诗歌朗诵会，他自己也时常去参加。有一次，朱先生以深沉微颤的声调朗诵了冯友兰先生的一首七律：“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在场的同学无不肃然，有的还悄悄流下了眼泪。

朱先生在动荡的岁月里尤其关心学生们如何做人。他在给清华毕业生题词中这样写道：“向来批评清华毕业的人，都说他们在做人方面太稚气、太骄气。但是今年的毕业同学，一年来播荡在这严重的国难中间，相信一定是不同了。这一年是抗战建国开始的一年，是民族复兴开始的一年。千千万万的战士英勇的牺牲了，千千万万的同胞惨苦的牺牲了。而诸君还能完成自己的学业，可见国家社会待诸君是很厚的。诸君又走了这么多路，更多的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谆谆教导、殷殷期盼，跃然纸上。

在联大流亡学生眼中，朱自清先生是良师、是益友、更是慈父。

大鼻子英国诗人

大鼻子英国诗人兼批评家，威廉·燕卜荪先生，刚刚被北京大学聘为外语系教授，还没来得及走马上任，就赶上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大鼻子诗人倒也不以为意，先是义无反顾地直赴长沙，而后又追随着南下的联大大军一直来到了蒙自。自此之后，南湖的边上便经常可以看到他背着双肩背包、戴着近视镜、目不斜视、匆匆赶路的身影了。

诗人教授好像是个急脾气，走路急匆匆的，讲起课来也是急急忙忙的。急急忙忙地将整段整段的莎士比亚、乔叟、斯宾塞一字不错、一句不漏如流地背出，急急忙忙地抓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又擦、擦了又写，然后还要急急忙忙地加以评点，仿佛稍有停顿便会阻塞他的灵感似的。大串大串纯正的牛津音不停地从诗人嘴里流淌出来，令初次听课的学生常常忘记从文学巨匠们的诗作里汲取养分，倒好像是专为欣赏诗人教授的风采而来的。

急急忙忙的诗人，有时候还会不知不觉地把黑板擦放到自己的西服口袋里，然后便“喔喔”有声地满世界寻找。迷惘、绝望之余，便会毅然扯起一只西服袖子，代替黑板擦在黑板上死劲地擦。粉笔末纷纷扬扬地落到诗人越发红通通的大鼻子上，看上去好像是一根胡萝卜顶上了几根白胡须。此时的诗人是最可爱不过的了。

诗人也有不那么急急忙忙的时候。路过学生宿舍时，他会驻足良久，为的是尽情倾听里面一位张姓同学的胡琴声。月圆之夜，他会登上蒙自城头，掏出西服口袋里装的两瓶酒，慢慢地自斟自饮，微醉方归。在南湖边上的小咖啡馆里，他还会旁若无人地看上好一会儿书，然后再一次次熟门熟路地翻过法国银行的高墙回到自己的卧室去。

诗人酷爱抽烟，尤其喜欢一边打字一边抽，往往搞得满室烟雾弥漫，不见其人，只闻打字机声嗒嗒。有一次，诗人在路上被人打劫，钱物给掏了个精光方才放行。诗人左思右想独独舍不得常常刁在嘴里的那个烟斗，追上去居然要了回来。每每提及此事，诗人总是心下甚喜。

还有一件让诗人自以为幸的事与诗人的另一大嗜好——喝酒有关。这一天，诗人喝完了酒兴高采烈地回了家，临睡前，随手就将眼镜塞到破皮鞋里。第二天早上起来，诗人蹬上皮鞋正要去上课的时候，突然被鞋内的“异物”吓了一跳。慌慌张张地掏出来一看，他那宝贝眼镜早已遭了殃。“还好，我只踩破了一个镜片，喔，喔，好运气！”诗人在忙不迭地把他的“好运气”与学生分享了之后，便每天依旧戴了这个“半壁江山”急急忙忙地来来去去了。

诗人的住所算不上舒适，大批的书报和各式各样的酒瓶、烟罐更使房间显得狭小而幽暗。诗人自己却很喜欢。他常常在这里一连工作几日几夜，好几天也不出门。学校刚刚迁来蒙自的时候，因为教材奇缺，学生和教师手里都没有书。诗人就凭着记忆亲手打印讲义分给大家。工作累了，诗人最喜欢用凭窗观风景的方式进行休息。“我最喜欢这扇意大利式的格子窗和窗子以外的风光。你看，我坐在窗旁，便可以看风的吹拂，云的飞扬，和树木的摇曳——中国有许多好地方，叫人留恋不已。”诗人这样说道。

遗憾的是，大鼻子诗人还没来得及到别的好地方去，欧洲便已战云骤起。大鼻子诗人迫不及待地将他全部的藏书送给联大图书馆，然后便拖着他那双破皮鞋，日夜兼程地赶回去投笔从戎、报效祖国了。

难忘五四

难忘“五四”——北京大学的先辈们“在‘五四’运动中完成了无比的功绩”，而且还因为1944年的这一天，是“联大民主精神复兴的一天”，而从1945年的这一天开始联大被赞誉为是“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是早在1939年就由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提出而国民党政府同意的。可是随后，善变的国民党政府因为对1919年5月4日一事始终心有余悸，所以1944年的时候，就又把青年节改在了3月29日。为此，联大学生首先发难，展开了定名为“五四纪念”的盛大活动以示抗议。

5月3日晚，联大历史系率先举办了规模宏大的“五四”座谈会。应邀出席的闻一多、吴晗等教授以及与会的同学在可容纳几百人的大教室里，纷纷踊跃发言。大教室内一时人满为患，连窗台上也站满了人。

“五四”当天，《联大半月刊》、《文艺生活》、《潮汐》、《民主》等30多种壁报就像那忽如一夜春风来的千树万树梨花一样，陡然开放在联大的民主墙上。晚上，悠悠体育会举办的营火晚会如期进行。但原定由文艺社主持的“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晚会由于三青团的干扰，延期至8日举行。

8日晚，联大学生与闻讯赶来的云大同学一起，3000多人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对着熊熊的篝火聆听朱自清、罗常培、冯至等十位名教授的演讲。慷慨激昂的闻一多先生在晚会的最后发言中指着头上的星空对学生们预言道：“朋友们，你们看，月亮升起来了，黑暗过去了，光明在望了。”

继“五四纪念”之后，联大每年都举行盛大的“五四”纪念周活动，因皖南事变的爆发而一度进入低潮的联大学生运动也再次蓬勃兴旺起来。

如果说1944年的“五四纪念”活动只产生了一定的内部影响，那么1945年的“五四”纪念周则唤醒了整个大后方的各阶层群众。

纪念周是由相当力量的宣传攻势开路的：先是《五四特刊》的出版，继而“报联”在图书馆前张贴了8版联合的巨型壁报，壁报上醒目地刊出了对

18 位教授关于纪念“五四”感想的访问记录。前来观看者趋之若鹜。

4 月 30 日晚，纪念周正式开始。华罗庚教授首先在联大学生会举办的科学晚会上大声疾呼：“科学的基础应该建立在民主上。”紧接着，诗人光未然在新诗社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上朗诵了长诗《民主在欧洲旅行》。

一连几天，联大校园内盛况空前。到处都有来自校内外情绪高昂的大中学生、工人和记者。

5 月 4 日，纪念周活动达到了高潮。上午，学生及各界代表近万人在云大操场参加了由联大、云大等 4 所高校联合举办的“各界青年纪念‘五四’大会”。本来联大训导处还特地送给全校师生 2800 张戏票，想以此取消这次集会，结果戏票统统被联大学生收集起来，分赠给附近贫苦的百姓和士兵了。

下午，各校学生自治会再次联手，闻一多等民主教授们和青年学生手挽手、肩并肩进行声势浩大的大游行。一路上“组织联合政府”、“停止一党专政”等口号声不绝于耳。受到鼓舞的各阶层群众不断加入到游行队伍当中，顷刻便汇成了一条 2 万多人的民主洪流。此刻的春城沸腾起来，到处可见要求民主的标语，到处可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一发自肺腑的歌声。

至此，联大学生彻底实践了自己在 1938 年 5 月 4 日告全国同胞书中的誓言：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决不放弃这种责任。我们不畏艰难，不慕安乐，不为恶习所染。我们要深入到全国各地，为中华民族的对日全面抗战，担负起后方所需要的工作……

长征

一个真实的神话

长征是一个神话，是一个以人力战胜自然、战胜环境的真实的神话。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的两年时间里，长征战士纵横11个省市，徒步行走二万五千里，粉碎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突破了国民党中央军和10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两年中，战士们以平均每日行军71华里的速度，先后通过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居住区，翻越18条山脉，渡过24条河流，占领了大小63座城市。他们经过的少数民族区，其中有几个是30多年来任何一支汉族部队都没有进入过的。他们翻过的山，其中有5条是终年积雪，不仅此前从来没人爬过，就是此后也再没人胆敢问津的。他们渡过的河，水急滩险。他们所走过的路是世界上最难通行的羊肠小道。

平均每天都会发生一次遭遇战，每天都有战友在自己身边倒下。呼啸的子弹、噬人的沼泽、呜咽的江水、冰冷的雪山，随时都有可能夺去一个个年轻的生命。还有那难耐的饥饿，更像一把钝刀，慢慢地侵蚀着战士的躯体，销磨着他们的斗志。

没有人生来就愿意吃苦受累。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元气大伤的中央红军为了生存下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由此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

长征途中，尽管有种种人为的和天然的障碍，但“大无畏的精神，征服了一切险恶的环境；铁一般的意志，冲破了无比的艰难”。经过了遵义会议、再次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红军队伍，一路上大捷之声不绝于耳，最后终于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并在那里揭开了驱逐日寇的新篇章。

我们的美国朋友曾这样描述长征：这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更不能描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一支羸弱不堪的队伍，历经无数艰难险阻之后，反而“士气大增、万众一心”，汇集成一支滚滚的抗日洪流，这不能不说是发生在现代的一个真实的神话。

灵丹妙药辣椒面

一提起辣椒面，就会想起辣椒水，就会想起白公馆和渣滓洞。在战争期间，辣椒水是和竹签子、老虎凳共同戕害被捕共产党员的几大刑讯工具之一，闻者无不悚然。然而，谁又曾想到，仅仅一字之差的辣椒面却成了护佑红军战士平安翻过雪山的灵丹妙药。

一进入雪山地区，就恍如进入了一个迷幻的世界。只感到到处都是山，无穷无尽、无边无缝的雪山。找不到道路，觅不到人迹，也看不到鸟飞。天和地仿佛都起了变化，就连空气也显得生疏起来。阳光即使在它黯淡下来的

时候，映在山上，也足以使山峰变成光亮一片，银光闪烁，晃得人睁不开眼。

看到红军战士一点儿停下来的意思也没有，藏族向导惊恐地劝阻道：“不要再往前走了。前面到处是妖精！”妖精吗？此时此刻只怕是阎王老子亲自坐在上面，红军战士也要前去拜见一下了。

浓雾、风暴和冰雹是雪山的常客。云雾一起，雪山立即变成了一片深不可测的雾海。当战士们从山口上坐着向下滑时，不知有多少人的身影从此就永远消失在这滚滚的雾海里了。

风暴和冰雹来的时候，竟仿佛真的有精灵在作怪一样。山崩地裂般，大块大块的千年积雪从山顶狂泻下来，连人带物一齐卷裹着，转瞬间就又堆成了无数新雪丘。侥幸远离雪崩地点的，也被风雪吹得无处可藏、无处可躲。风夹杂着细碎而坚实的雪粒，一阵紧似一阵地密密袭来，像大把大把尖细的钢针执拗地向人们的手上、脸上和脖子上扎去。

排成纵队向上攀登的队伍像提线木偶一般，被风雪吹得一忽而集体向右跌倒，一忽而又集体向左扑去。冰雹更是雪上加霜，跌跌撞撞刚刚爬起来的战士还没从跌来倒去的晕眩中清醒过来，就又遭到冰雹的无情打击。冰雹大的如乒乓球，小的如蚕豆，不仅把战士们手上的雨伞、头上的斗笠打得稀烂稀烂，而且还把他们的头和手砸得不住地淌血。

眼看就要到山口了，战士们的力气也要耗光了。一个个嘴里像塞满了棉花，喘不过气，说不出话，更走不动路。眼睁睁望着那一二百米的距离却只想不计后果地坐下来歇歇、睡一会儿。

被人捏住鼻子、撬开嘴巴硬往里灌辣椒水是一种酷刑，可这时候，被人捏住鼻子、撬开嘴巴硬往里塞辣椒面却无异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辣椒面早在山脚下就已经准备好了，只不过，不到万不得已，是千万不能动用的。吃的时候要 and 雪揉成一团，像嚼炒豆一样，慢嚼慢咽。

这辣椒面还真的具有起死回生的作用。头脑清醒的人一招呼，尚有余力的战士纷纷强迫着众战友和着雪吞下了辣椒面。最后，凡是能把掺有辣椒面的雪团塞进嘴里的同志，全部登上了山口。

站在山口，战士们回望绵延不绝、毅然前行的队伍，默念起就此永别的亲爱战友，挥洒一把英雄泪，便又继续上路了。

山珍·海味·救命花

长征中缺少食物是出了名的，而贺老总的“山珍海味汤”在红二方面军也是出了名的。只不过，所谓的“山珍”只是野菜，而所谓的“海味”也只是贺老总亲自钓的几条小鱼而已。

贺老总第一次做汤，是在1933年。那时候，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等同志的率领下，由井冈山根据地撤出，迁往湘西与贺老总的红二军团会合。他们一路上马不停蹄、日夜征战，红军战士由9000人锐减到3000多。贺老总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红六军团进入贵州的消息后，马上动员苏区人民全力以赴迎接井冈山红军的到来。

会师夜以后的第一个早晨，红六军团的战士们一睁眼就看到每个人身边都放上了一双崭新的草鞋，自己那身三个月未曾洗过的衣服也已浆洗干净、烘干叠好放在枕边了。而此时，贺老总早已起身多时，到河边悠然垂钓去了。香美的煨鲜鱼汤对久病体弱的战士是多么大的慰藉啊。

贺老总第二次做汤，是队伍行进在草地当中的时候。进了草地，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疲惫已极的战士眼看着战友冻饿而死，却无力相助，也无力为亡灵培上一撮黄土。寻找可吃的东西成了军队中的头等大事。

有一天，善钓的贺老总居然钓上了几尾小鱼，大家赶着去挖了野菜，隆而重之地煮了一盆“山珍海味汤”。贺老总还特地派人请来了张金莲母女。张妈妈是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参加红军长征的：怀里抱着一个，背上背着一个，手里还牵着一个。她承担了所有缝缝补补、照顾伤病员的琐碎事情，行军的时候，还站在行进的队列旁为战士们作宣传鼓动工作，是长征的有功之臣。贺老总就借着这盆自己亲手煮制的“山珍海味汤”表达了对英雄母亲的敬意。

还有一种山珍是战士们自己发明的，那是一种浅颜色的大簇山花，属杜鹃科，有颜色的味道苦涩、微毒，纯白色的则鲜美可口。采回来以后，先用温水浸泡一下，挤出苦涩的汁水，然后就可以煮着吃了。战士们都叫它“救命花”。如果运气好，再能抓到一二只雪鸡、弄几朵“丛树菌”“伞把菇”，炖在一起，就是上好的“山珍汤”了。

大块朵颐之后，三三两两挤靠在一起，由宣传队吹奏上一曲战士们最喜爱的《梅花三弄》，征途中所有的艰辛困苦便仿佛都彻底地消融了。

只可惜，真的是“好花不常开”，出了中甸，就再也见不到这可爱的“救命花”了。

红军·共产·红军楼

今天迪庆高原上五六十岁的老者叫做“共产”、“红军”的不在少数。

60年前，那里的孩子刚刚出世的时候，正是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过迪庆高原的时候。汉藏民族有积怨，相互的隔膜本不是一日二日就能够消融得了的。再加上国民党从中挑拨，藏民一开始对红军的敌对情绪很严重。红军走在路上，轻则挨冷枪，重则遭到有组织的武装袭击。掉队的红军情况更糟，不是被剥光了衣物，就是无缘无故地失踪了。

正当战士们准备举枪自卫时，军政委用耐心的讲解抚慰了战士心中的愤懑。于是，一场尊重藏族兄弟、团结帮助藏族兄弟的活动开始了：为了尊重藏民的习俗，战士们自觉保护寺庙。夜晚，他们宁可冒着高原的酷寒而露宿野外丛林，很多人因此冻病了、冻伤了，但是没有人抱怨。战士们在帮助藏族同胞劳动的时候，喝碗水、吃块糍粑都会付上双倍的钱。他们甚至还组织起来学习藏族日常用语，打着手势对藏胞们解释：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们要到哪里去，谁是大家共同的敌人等等。慢慢的，藏胞们把粮食、马料拿了出来，把酥油奶茶拿了出来，把红糖、盐巴这些从外地运进来的稀贵之物也拿了出来……

一边秋毫无犯，一边至诚相待，友情的种子渐渐生根发芽了。不少父母给自己刚刚出世的孩子取了“红军”、“共产”这样的名字以纪念这段深挚的友情，而这一份思念也就一直弥漫了数十年。

不仅仅是迪庆高原的藏族同胞，也不仅仅是藏族同胞一家，羌族、彝族、苗族，凡是红军所到之处，又有哪一家少数民族不曾与长征队伍结下了兄弟姐妹般的真挚情感呢？

红军刚刚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由于国民党的造谣诬蔑，群众对红军深感恐惧，纷纷四处逃避，使得各个山寨空无一人。红军战士一边刷标语、

散发传单，进行口头宣传，一边以自己的行动使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破。在侗寨龙坪，国民党敌特人员化装成红军放火烧寨，疲劳已极的红军战士一个个纵身火海，奋勇扑救，保住了村寨东南片的两百余户木楼，特别是保住了一座建于清嘉庆九年（1779年）的侗族鼓楼。这座楼是侗族同胞集会议事、休息娱乐的地方，很为侗族人民所看重。大火扑灭后，红军战士在侗族同胞的协助下，抓获了特务，拆穿了敌人的阴谋，还为受灾群众发放了银元。后来，侗族人民为了怀念红军，就把鼓楼改名叫做了“红军楼”。

疑虑和恐惧打消了，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了村寨。他们不仅为红军筹办粮草，而且还翻译带路、护理伤病人员。红军走后，侗族人民编了许多山歌、侗戏讲述这一段故事。这些山歌、侗戏至今一直在流传着。

流传下来的，不仅仅是这些溢满浓情厚谊的故事，而且是红军战士忍辱负重、救国救民的精神。红军战士当年刷写的标语“继续斗争，再寻光明”，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着。红军长征走过的路，被当地人民称作“红军路”，红军当年翻过的山，被当地人民称作“红军山”。当地人民用“红军”、“红军楼”这样的名字，纪念军民之间不灭的友情；用“红军山”、“红军路”这样的名字，鼓励自己像红军战士一样以坚韧不拔的精神不断地向前迈进。

“米老鼠”戏弄“大笨猫”

长征途中，有过这样一首“标语诗”：远看一条索/近看鸭池河/敌人拼命堵/老子硬要过/要过要过这就过/李觉送行蛮不错/你在对岸站岗哨/我在这里洗个脚。

这首诗写于最后一批红军渡过乌江以后。诗中的鸭池河位于乌江上游。远看像条绳索，仿佛抬脚一迈就能过去。实际上，水底暗流湍急，河床时宽时窄深不可测。河的两岸更是山岩陡峭高达数十丈。在敌人重兵把守下，红军真的是插翅难飞。李觉则是国民党的著名将领。

然而，红军不仅“飞”过去了，而且还悠悠闲闲地洗脚、作诗，这情景岂不像“米老鼠戏弄大笨猫”一样吗？红军虽然弱小，但精明乖巧，敌军虽然在力量上占优势，却蠢得出奇、不堪一击。

事实上，事情远没有诗中写的那么轻松。红军并不是在敌人重兵把守下过的河，而是打了一个时间差，趁着兄弟部队把敌人主力“调”到贵阳附近，便争分夺秒地抢渡鸭池河。为此，工兵营的战士连夜探水深，测流速，编制竹排，投锚架桥，冒着霏霏细雨在冰冷的河水里一直奋战了两天两夜。刺骨的河水将战士的手脚冻得裂口流血，敌人炮弹在水里激起的股股水柱、排排气浪使战士的手脸多处受伤。

最后一批红军刚刚过了桥，敌军主力也已经赶到。敌人的前卫哨兵与红军的后卫哨兵正好隔江相望。情势之急迫可以想见。

事实上，眼看着主力部队已顺利过江，忙碌了两昼夜、此时大松一口气的写诗小战士，原本是想在水里尽情洗个澡的，可由于时间紧迫，而且他也再没有勇气重新置身于冰冷的江水中，所以只好坐在江边洗了洗脚。

事实上，就在小战士洗脚的片刻，几位工兵营战士饿昏在他的面前。发给他们的几块糍粑一直放在江边的大石头上，没人顾得上吃。

而李觉也并不是不堪一击。他曾使红军在湖南找不到立锥之地，还曾在广西对红军紧追不舍，致使红二师的易团长战死，杨政委负伤。这次的乌江

之战，又迫使红军主力屡屡转移。李觉实在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率领的军队也素有“铁军”之称。

不过，此时此刻，看了这首写在河对岸、近在咫尺岩壁上的标语诗，鼎鼎大名的李觉只怕真的会像大笨猫一样，气得昏倒在地了。

我们看书、看电影，总能发现诸如此类“米老鼠戏弄大笨猫”的场面。可真实情况是，在长征途中，敌人精良的武器装备确实对红军构成了威胁，敌军的将领也确实多为出自黄埔军校的精英。战争的惨烈是不可言状的。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没有哪一次战役不是险象环生，也没有哪一次胜利不是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枪林弹雨中，与冲锋陷阵的红军战士始终相伴的是一颗颗乐观、幽默、好胜、年轻的心。

红军先生，背朝云南

“靠四川喽！红军先生，背朝云南！”当我坐在江轮上听到大副从扩音器里招呼岸上群众时，我的耳畔仿佛响起了62年前摆渡船工陈月清的这句呼吼声。那时候自然没有扩音器，但想必他的声音也是如此如洪钟般响彻大江两岸，因为他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在吼，在激流中、在疾驶的木船上。船工本人自然也不是四川人，但想必他的声音也是如川音般可亲可敬，因为他用心在吼，为了保持船体的平衡，朝着站在船中央的红军战士们吼。这荡气回肠的吼叫声一直持续了整整9个白天黑夜。

红军长征北渡金沙江共经过五大渡口。上述这一幕情景就是红一方面军在“皎平渡”过江时发生的。横渡金沙江对红一方面军来讲，是长征以来最冒险又最成功的一次行动。谓其冒险：当红军战士们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终于甩掉紧迫在后的“尾巴”，大步流星赶到金沙江边时，南岸所有的船只都已经被敌人封锁了。一旦稍有耽搁，“觉悟”了的“尾巴”马上就会追踪而至。到那时，前有滔滔江水，后有追兵无数，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谓其成功：30多名船工驾着6条破船划了9天9夜，硬是将2万5千多名红军战士安全送过了江。整个行动中没有损失一个人，令迟到的敌兵气得只有翘胡子、跳脚的份儿。

导演这一出“米老鼠戏弄大笨猫”的不是别人，正是陈月清等30多名船工。他们中间有一位彝族老人殷孟芝。金沙江水流湍急，白天渡江尚且不易，漆黑的夜里就更不必说，故而“夜不渡皎平”的规矩是祖辈相传的。但这位老人在红军的危急关头，硬是打破了这一规矩，带领红军突击队，驾着他那刚刚用旧布烂絮堵好漏洞的破船摸到对岸，奇袭守军，从敌人眼皮底下抢回了三只木船。他们中间有穷苦船工张朝寿哥俩，是他们帮助红军战士从水底下打捞起一条破船，修补修补，驾起来就用。还有傣族艄工李有才，是他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从上游鲁车渡拖回了两只宝贵的船……正是这些船工，忘却了自身的安危，傲立于水天之间，凭着一腔热血，仗着几只破船，与湍急的江水搏斗，向横飞的子弹挑战。

横渡金沙江只是万里长征中的一小段，皎平渡也只是金沙江5大渡口中的一个。然而，我相信，每一位过江的同志都永远不会忘记那声如洪钟般的呼喊：红军先生，背朝云南！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长征实在是一个不朽的民族寓言。它与远古时代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一脉相承，展示了中国人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和

多灾多难的历史中百折不挠的气概。它与其他民族的史诗、寓言，如犹太人出埃及、过红海，美国人开发西部遥相呼应，体现了人类在厄运中非凡的勇气、想象力和首创精神。重温长征故事，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次灵魂的洗礼。

美国西部开发

能人的时代（一）

美国人从小是吃牛肉长大的，这恐怕连中国的小孩子也都会知道。其实，美国人大吃特吃牛肉也不过是一百来年的事。一百多年以前，肉也只是贵族老爷和有钱人的食品，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讲，它是只有节日里才能享受一下的美味佳肴。

导致了这一巨大变化的，是内战快要结束时发生在美国西部荒漠上的一个“奇迹”。

一大队满载货物的牛车在通过怀俄明东面的平原时遇到暴风雪，赶车人被迫弃车而返。第二年春天，赶车人念念不忘他的货物，于是就故地重访。他怎么也没想到，迎接他的不仅仅是货物而且还有一群膘肥体壮的牛。他本以为这些牛早就饿死了呢。

原来，一直被人们认为毫无价值的“美国大沙漠”孕育着一种不需要雨水的“仙草”，它可以使牛群在整个冬天赖以为生。

西部的牛本身也有许多不同寻常的优势。不同于东部被娇宠坏了的短角牛，西部的长角牛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它们猎狗般的鼻子能嗅出哪里危险哪里安全，据说还能嗅得出15英里以外在下阵雨。在没有草的地方，它们甚至还能像长颈鹿一样够着树上的嫩枝和叶子吃。

消息一经传出，一群聪明伶俐反应迅速的家伙立即来到这片荒莽西部的茫茫原野上寻求他们新的财富。“地面下有黄金，但是地面上的黄金更多”，当众多的人们仍旧纷纷前往科罗拉多大做黄金梦的时候，这一少部分人已经使一股新的“淘金热”在西部地区悄然兴起了。

首批的淘金者，他们的方法简单而巧妙——派克斯峰是前往科罗拉多的必经之地。人们在翻山越岭之前往往需要处理掉随身携带的笨重物品和牛车。这些新淘金者们便在山峰附近的普拉特河旁开办了一个大养牛场，以收购或代养这些牛，寄放费是每头每月一美元。所谓大养牛场其实就是那片神奇的平原。新淘金者们买下那些精疲力竭的拉车牛，让它们用平原上不花钱的野草把自己喂肥，然后再以大价钱把牛肉卖给继续西进的大车队。

再后来，他们干脆迁往丹佛做起大买卖来。他们低价买下外来移民求之不得想要脱手的“走痛了脚”的牛，用肥美的牧草调养调养，过不了多久就高价卖出去，替换另一只“走痛了脚”的拉车牛了。如此一来，他们财力猛增，很快拥有了自己的牛群。

拥有自己的牛群意味着财富，也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当把牛群赶往东部或者北部以卖得一个好价钱时，一路上武装的骚扰、偷牛贼的惊吓往往使牛主人损失惨重。曾有人这样回顾道：“人生三百六十行，很少有像赶牛这一行那样拿大笔财产去冒险的了。事实上，赶牛人几乎和小孩子一样无用，只要走错一步，他就会丧失整个牛群，也就是丧失他在世上的全部财产。”

幸运的是，一些富有想象力的西部拓荒者很快摆脱了这种动荡不安的局面。他们建立了牛城，然后用火车把牛和牛主人们运往他们想去的地方。牛城就建在横贯美国大陆那条铁路的最西头。地点尽量靠西，这样赶牛人就无需穿越广袤的荒野。在那里西部的赶牛人和北部的买牛人可以公平地讨价还价，如果价钱不合理，赶牛人还可以把他的牛群继续运往东部。

牛城的建立和铁路的使用对赶牛人来说是一个喜出望外的好消息。因为无论白天和黑夜，对可能发生麻烦和暴力行为的担心，就像梦魇一样压在他们心头。他们简直不能相信竟然会有人不用蛮横态度和抢劫行为来接待一个西部的赶牛人。为此他们总是在牛城里大摆宴席，喝酒、唱歌、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以表达他们轻松欢快的心情。

当初这一计划刚被提出来的时候，无论铁路公司的经理还是地方的头面人物，全都嗤之以鼻。然而这些不肯认输的人居然真的就有了“点石成金”的魔术，在赶牛人、铁路公司、荒凉的小村庄、当然还有他们自己面前，堆起了无数座金光灿灿的小金山。

能人的时代（二）

有一天，一大批赚钱的盐井都被一种黑色的油状物质污染了，也许是当局者迷，众制盐商一时间恍如大难临头，如丧考妣。而另一位有胆识的商人却乘机接管一口“被破坏了的”盐井，成立了美国药用石油公司。他仿照着印第安人的做法，将这种黑油装瓶出售，名之曰“美国油”。

“美国油”一旦走俏，效法者自然不乏其人。说来也怪，这种油居然也就源源不断地汨汨而出，一发而不可收了。过多的石油使红极一时的“美国油”身价日跌。有心计的销售商不得不另辟蹊径，高薪聘用耶鲁大学教授对石油进行全面试验，以期发现它的其他用途。结果表明：“从油中提取出来的液体用来点灯，同他们见到的任何灯一样明亮”，此外，这种油燃烧起来消耗缓慢，亮度稳定而且无烟。此时的美国正在憧憬着“每个房间里有一盏灯”这个时代的到来，耶鲁教授的研究结果可谓恰逢其时。

美国人对石油的收集一直沿用的是从印第安人那里学来的老办法。然而一些被公认为是“疯子”的人却异想天开地要从地底下钻出油来，就像抽水一样把油从地下抽上来。这一次来的是只受过小学教育，没经过任何技术训练、也没有任何采矿知识，而且正四处流浪的前铁路列车员德雷克。

福至心灵的德雷克，一到现场就被“钻油”这个“疯狂”的念头“迷惑”住了。在众人眼里，他是如此疯狂，以至于没有任何一名钻探工愿意为他效劳。最好笑的是，第一个表示愿意为他钻油的盐井钻探工，在签了合同后就逃之夭夭了。其理论是，如果要摆脱掉“疯子”，最好的办法就是签订一份合同，装着一定会来的样子。

谁也没想到，“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老话还真的起了作用，以至于当油实实在在地被抽了上来以后，毫无准备的德雷克不得不用威士忌酒桶、浴盆以及身边一切见得到的东西来盛它们。

还有一种有趣的场面发生在聪明的油商运送石油的时候。早期的高产油井往往集中在油溪附近。不过，溪水一向很少，不足以把一桶桶的石油浮起来，流送到运往市场的驳船边上。油商们只能舍近求远，花高价用马车和火车“联合作业”。就好像“行行出状元”这个中国古训一样，美国西部有胆有识的人也无所不在。他们对溪水采取了“小溪截流筑水坝”法，预定的放水时间一到，“按照规定的准确时间，从上游开始，一个个水坝依次打开”，不断集聚起来的水一下子奔腾而出，下流整个的溪流水位在几分钟内迅速涨高。下游两岸沿溪的船工们此时早已作好了准备：石油装上了小船，小船解开了缆绳，大水一到，他们立即使船离岸。集聚起来的水就这样一直将小船

漂送到了他们理想的港湾。

还有一个聪明人在这里是不能不提及一下的。他就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在那个石油尚未成为稳定商品的年代，许多人因为石油而发财致富，许多人同时因为石油而倾家荡产。只有强硬的洛克菲勒设想出一种控制整个市场的巨大联合企业，最终垄断了美国石油行业。

美国西部拓荒是一个充满混乱与竞争的时代，也是一个能人倍出的时代。正是这些能人，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寻求别人从来没有想象过可以在那里得到的东西。他们不仅在沙漠中生产出了牛肉，而且在石头里找到了油，给千百万个家庭带来了光明，最终实现了美国人“希望每个房间里有一盏灯”的美好梦想。

永恒的传奇人物——西部牛仔

提起西部牛仔，人们自然就会想起草帽、洗得发白的牛仔服，一张刚毅果敢晒得黝黑的脸，一把快枪和一匹骏马。

在美国大片没有引进之前，美国西部片曾经很是兴旺了一阵，以至于人们如今偶尔说起西部牛仔，仍然会有一种隐隐的激动兴奋的感觉。狂放不羁、只与自己的枪和马为伴的独行侠和钢铁硬汉，这便是影片中的牛仔形象。

其实，真实的牛仔生活并不是这样的。印第安人随时的侵袭，牛群随时可能因受惊而发生的乱窜，都会使牛仔们神经紧张得要过敏。

牛群受惊乱窜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尤其是在晚上，那时候，就连最勇敢的牛仔也要恐惧得产生出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几千头牛刚刚还带着千姿百态的睡相相互依偎着安静地打盹儿，忽然间一下子就全部惊起，吼声如雷地拥挤着乱作一团。它们翻来滚去，不停地向右绕圈子。此时，牛仔们要想保全性命只有靠自己的马了。几个牛仔、几匹马一起来一个危险的包围战术：他们围住乱糟糟绕着圈子奔跑的牛群，由外向内，努力使包围圈越缩越小，直到逼迫着牛群挤挤挨挨地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才能罢手。如果他们做不到这点，那么一切就都完了。牛群就会像火花一样冲出去，迅即消失在茫茫的黑夜里。

曾有人这样回忆道：“大群惊窜的牛积聚起来的热量是惊人的，牛角和牛蹄相互撞击所产生的气味几乎令人无法忍受。有时候，尽管天气凉爽，在奔跑的牛群的下风，却有一阵令人难受的热气。为了防止牛因受热而掉膘和丧失肌肉的力量，有经验的赶牛人在牛群行进时，总是让牛适当地散开。动物身上产生的热似乎会吸引电，尤其在牛群身上潮湿时是这样。有一次，在一场暴风雨过后，我看见几个骑马赶牛群的人，他们的脸都给烤焦了，就像被炉火烤过似的。”事实上，真的是脸给烤得跟关公似的倒也没什么了不起，最要命的是那些草原犬鼠的洞穴，还有冲沟和悬崖。对于那些只顾骑着马狂奔赶牛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即使是在大白天也已经够危险的了。

为了尽量减少上述种种危险事情的发生，这些钢铁硬汉们在夜间巡逻时总要给牛们唱一些被他们称之为“赞美诗”的东西，为的是告诉正在熟睡的牛们是朋友而不是敌人在为它们守夜。想来其情形一定宛如温柔的小保姆给乖婴孩哼唱催眠曲一般。“赞美诗”的曲调来自于牛仔们童年记忆中教堂里的各种乐曲。歌词则兼而有之：或是讲述一些著名赛马的光辉业绩，或是重复咖啡罐上的广告用语，再或是一些随便脱口而出的对牛群表示亲昵甚或辱

骂的词句。据说，听惯了“赞美诗”的牛群竟真的不大因受惊而乱窜了。

我行我素的独行侠是不可能存在的。赶牛的路上，所有的牛仔都置身于一种准军事状态下。不允许喝酒、赌博，也不允许有私人的仇怨。任何一个人的粗心大意或是冲动，都可能意味着大祸临头和全体人员的死亡。许多不久以前在内战战场上还互相对峙的对手，在这条牛路上又都重新联合了起来。

这是牛仔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牛仔们分成几批，在各个小队长的指挥下，跑遍整个地区，把碰到的牛全部赶到会合地点，供牧场主们清点财产。每个牛仔随身带上自己的一群马，少则八匹，多则十匹，在峡谷里上上下下满山遍野地追赶母牛和幼犊。春天的气息和四周莽莽的景色使马儿们浑身是劲儿。牛仔们稳稳地坐在欢腾的马上，一连奔驰许多英里，一路上不停地挥动绳索，扯倒一头又一头活蹦乱跳的幼犊，那充沛的体力、优美的姿势和娴熟的手法无不登峰造极。西部片中那些理想化的牛仔想必一定是出自这里了。

真实的牛仔生活固然充满风险和灾难，令人不得不时时绷紧神经，然而，他们留给后人的却是胸怀坦荡、豪气冲天、扶弱济贫的英雄形象。

当他们打着手语、越过隆隆的牛蹄声相互交谈时，当他们保护了贫弱的妇女儿童时，他们便成了人们心目中永恒的传奇英雄。

也许我们不得不对历史真实中的西部牛仔与文学艺术中的西部牛仔有所区别。在历史真实中，美国西部的开发并不像“西部片”中所描写的那样如牧歌般浪漫，如凯歌般推进。其中，不乏无法无天的愚昧、血淋淋的仇杀，还有对“新大陆”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野蛮征服。但是，正如一位哲人所说，道德的“恶”往往是文明演进的动力。西部牛仔的故事被“寓言化”后，我们毕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人类筚路蓝缕的创业冲动，看到了七尺男儿在大自然的洪荒中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栉风沐雨的挺拔身姿。

从牛仔身上，我们可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生与命运的关系。从牛仔身上，我们领略到一种原始的、磅礴的生命力。这种生命体验将使我们在和平年代的人生变得更有力度、更有质量。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青春无悔

自从粤菜独树一帜火爆京城以来，京城的饮食大观便一发不可收拾。什么川菜馆、湘菜馆、傣家菜馆，还有东北大菜馆，一个个颇具名目的“馆”如雨后春笋般争先恐后冒了出来，遍布京城大街小巷。

其间能引得行人止步稍事停顿的，往往会是那些题名为“老三届”之类的小饭馆了。

“老三届”并没有遍布京城，也不具备显赫的门面，引得人们驻足停留的是“老三届”所代表的整整一代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摸爬滚打的人。

“大革文化命”（侯宝林老先生语）伊始，全国近千万中学生宛如笼中飞出的小鸟，纷纷扑向社会。终止了学业的学生，转瞬间成了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和挥斥方遒的红卫兵领袖。等到“祖国江山一片红”了，小将们的出路也成了问题。积压了几届的学生，社会上无力接纳，学校里容纳不了。1968年12月，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于是，“老三届”（1966年—1968年）初、高中6个年级的学生带着印有“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字样的水杯，告别了父母家人，几乎一个不留地迁往农村“经风雨、见世面”去了。

轰轰烈烈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1966年陆续开始，一直延续到1976年左右。10年里，总共1403万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里”接受了再教育。其中，1048万人在农村社队，126万人在新组建的青年集体场队，还有229万人则被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接纳了。

受够了风雨考验的老三届们，自从大规模返城以后便沉寂了下来。昔日“天兵天将”的凛凛威风、下乡伊始的勃勃朝气以及知青生活中的种种凄惨惨切切仿佛都已经烟消云散。

然而，沉寂并不等于无所作为。老三届们从最底层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着。在经受了那么多磨难以后，除了命运的捉弄，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他们默默地掀起上夜校充电的浪潮、下海经商的浪潮，当然还有出国的浪潮。往日张狂的少年如今早已多了几分沉稳、几许圆通。他们将当年集体高喊“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的精神活学活用到每个人的“创业史”中，为自己展现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未来。

当历史又向前推进了十几个春秋时，老三届们终于有暇直面自己的过去了。1990年，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在北京举办“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1991年，原广东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分别在广州和重庆举办“历史为平凡作证——海南、广东兵团知青生活回顾展”和“青春无悔”大型图片展。当然，也有人率先在京城办起了“老三届”饭馆。

咒骂过，诅咒过，然而10年的青春生活无法从记忆深处抹掉。他们曾面对着大山、面对着黄土地高声呼喊：“我来啦！不走了！”他们也曾在那些忘我地战斗。他们把青春和爱留在了那里，青春的回忆是一辈子的回忆。

午夜梦回，是不悔的青春。

国防绿的诱惑

三四十年前，一身“国防绿”对男女青少年的诱惑绝不亚于如今“带牌子”的牛仔服和休闲装。更何况把孩子交给兵团，生活待遇有保证，吃穿住行有人管，多数家长也更放心一些。所以一大批十来岁的孩子便怀着“好儿女志在四方”、“屯垦戍边保卫海疆”的凌云壮志，在父母亲忍不住的离别泪中，陆续奔赴全国12个生产建设兵团。

在这些男女青少年的心目中，自己要去的“地方”是“头顶香蕉、脚踩菠萝”，“电钮一按，母鸡就下蛋”的地方。可等他们到了目的地，不仅没看到母鸡的影子，很多人的营房在哪儿都成了未知数。理想中的“国防绿”也变成了“兵团绿”，一种土黄色、肥大而质量不甚好的“军装”。

“兵团绿”们并没有斤斤计较这些小小的失落。“生产建设兵团”嘛，自然就要靠建设。于是他们便斗志昂扬地投身到自己的第一大战役——脱坯盖房中去了。

半大的“兵团绿”争强好胜，还没等连队鼓动，自己就展开了劳动竞赛。无论干什么均采用快节奏，拉坯时一路小跑，脱坯时钢叉上下翻飞，还流行起诸如“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一类“豪情万丈”的誓言。

一天下来，动作快的，来回跑400多趟，扣1200多块坯。动作慢些的，至少也跑上300来趟，扣800来块坯。如此大的劳动强度，没过多久就培养出了一批“大肚汉”、“大肚婆”。“大肚婆”一顿能吃1斤7两米饭，“大肚汉”一顿能吃5斤！

然而，这还只是个开始。在往后“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日子里，“兵团绿”为“人定胜天”的坚定信念激昂着，创下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无论是“向沙地要良田”的北方兵，还是“向高山要橡胶”的南方兵，尽管累得男战士走路开始打晃，女战士则边走边哭，但他们都可以自豪地对后人说：“前人从未干过的事情我们干了。”

与高昂的士气和“兵团绿”们炽热的血液所不相符的是吃的问题。大肚汉、大肚婆们随心所欲大嚼米饭是偶尔会餐时发生的事。每顿两个拳头大的红薯面窝窝头，外加一碗“玻璃汤”（不放菜，只有水和盐的全透明汤）才是“兵团绿”的家常便饭。上顿不饱、下顿不饱、顿顿不饱的“兵团绿”尤其“偏爱”那碗汤，还特意为它编了顺口溜：

汤，汤，汤，革命的汤，
早晨喝汤迎朝阳，
中午喝汤暖洋洋，
晚上喝汤勤起床。

虽然食物贫乏如斯，兵团里却是“共产风”刮得最盛的地方。“共产”的对象往往是烟、酒、糖、茶等来自个人家乡的稀有物品。谓之稀有是因为“兵团绿”探家的机会不多，而家里也不能总往兵团寄东西。然而，一旦谁拥有了一些什么，便会很慷慨地拿出来与人共享。

本来是因为生活条件有保障才被父母送到兵团的“兵团绿”们，却比散兵游勇的插队知青受了更多的磨难。他们是兵团战士，疲惫了、受委屈了，不可以随随便便躲回家里。他们肩负着垦荒戍边的任务，他们尽职尽责地做到了这点，因而也就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本就聪明伶俐、敢想敢干，一旦撒入了农村这一片广阔的天地，自然更不免要大显身手起来。

下乡没过多久，“野性”未收、喜欢在外面闯荡的，对外便自称是全国最大单位的职工，单位信箱为 10079。所谓最大单位，其实就是指农村，“1”是扁担，“00”为粪桶，“7”乃锄头，“9”则是舀粪水用的勺子。

农村比不上城市。如果是“扎根”在山上，情况就更糟，不仅缺吃少喝，而且离哪儿都远，干什么都不方便。于是就有了跑 15 公里路买雪糕和为看一场露天电影夜宿金沙江的故事。

高高在上的山区，寂寞而艰苦。夏日里顶着大太阳锄草，没一会儿便头昏脑胀起来。要是能咬上一口那通体冰凉而又甜丝丝的雪糕……念头一出，几个“知妹”把锄头往“知哥”手里一放，兴冲冲地奔下山去。这一奔，就奔出了 15 公里地。穿过隧道、铁路，一路上唱着“向着山下、向着雪糕……”连跑带颠的知妹们，一见到雪糕就不要命地一支接一支吃将起来。直觉得山里的雪糕比城市里的冰淇淋不知要好吃多少倍。这恐怕也是她们这辈子觉得最好吃的雪糕了。

夜宿金沙江的是几位“知哥”。听说江对岸要放映露天电影，他们几乎乐昏了头。千载难逢啊，容易么！于是一大早就相互吆喝着上了路。渴了，喝几捧路边的泉水；饿了，啃几口自备的玉米饼和红薯。那份开心劲儿，简直只能用一路相互的拳打脚踢才能发泄出来。

看完电影，已经是晚上 9 点多钟了。过江么，没船了；住宿么，身上没钱。“知哥”们一商量，干脆睡江边算了。几个人一人用手刨出一个沙坑，再找上一块鹅卵石作枕头，就在黑灯瞎火的沙滩上享用起“沙子浴”来。

睡得正香呢，却被一连声的“打狗，快打狗”惊醒了。原来不知道是哪位“知哥”很荣幸地被条野狗在脸上舔了又舔。“知哥”到底还小，睁眼一看，连身体都没来得及动一下就惊叫开了。

觉是不敢再睡了。几个人背靠着背，坐在沙滩上，唱了半夜原苏联民歌《卡秋莎》。

由此，农村人认为城里人很“凶”。然而让他们认为“城里人就是凶”的，却是另外一件与吃和玩无关的事。

老赵是 66 届初中生，因为对组装收音机略知皮毛，曾经把自家的有线喇叭修得比别家的响了许多，为此，村里人认为“老赵凶”。

正是农田施肥的关键时刻粉碎机不转了，满心指望靠它打骨粉作肥料的村长不由得愁容满面。很有些急智的书记按照会修喇叭必能修电动机的逻辑，特地派人请来“很凶”的老赵。

被人充分信任的日子并不好过。老赵别说对电机原理一窍不通，就是电动机也还是头一次见到。装模作样地换上保险丝，一合闸，保险丝“叭”的一下又烧了。他一时有点不知所措，借口要回去翻翻书，开溜了。

村长、书记却是对他百分之百地信任。托人转告他，工就不用出了，一切以挽救粉碎机为重。第二天再次走进打米厂时仍是一头雾水的老赵，摸摸这，动动那，又看了看填满骨头的料斗。忽然福至心灵地从料斗里抽出了几块大骨头，他壮着胆子吩咐合闸，电动机吭吃吭吃转了转，又要罢工。赵知哥灵机一动，顺手又悄悄抽掉了两根骨头。电动机居然紧接着就一下一下飞转起来。

喜出望外的村民们使劲拉着赵知哥的手，连声说：“老赵，你太凶了，太凶了。城里人就是凶……”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下乡第一年的日子是相对好过的。每人都有一小笔安置费，还有从家里带来的珍品藏货，再加上纯朴热情的农民们逢年过节的款待，一年一晃就过完了。

随着受再教育程度的加深，填不饱肚子的现象开始屡屡发生。到了即使精打细算过日子也会有断餐危机的时候，知青们就只好各显神通了。

女知青心细如发，往往能有一些创举。没菜的时候，可以讨一些没人要的蒜苗须须。洗干净，加醋拌拌，一碗白生生脆嫩嫩还带有淡淡清香的看家菜便上桌了。如果碰巧还能讨到一块肉皮，炒菜之前用皮擦擦锅，然后就可以吃上一顿颇令别个知青羡慕的贵族菜了。肉皮呢，当然还要珍而重之地收起来，留待下次再用。真到了没钱买油盐的时候也可以从别的地方硬挤出一些。什么用过滤澄清的草灰水代替肥皂啦，什么靠晒干的向日葵秆照明代替煤油啦，总之，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还是有的。

男知青胆大，饿急了，只要能找到肉，也不管是哪种动物的肉，一概囫圇吞下。什么蛇呀、狗呀、猫呀、黄鼠狼呀，一旦落入男知青之手，绝无生还的道理。其他诸如泥鳅、田螺、黄鳝等种种农民们不屑吃的东西，自然更成了知青碗里的美味佳肴。

到了实在无米下锅的时候，就只好去“跳丰收舞”。“跳舞”的对象当然最好是鸡，“跳”之前则要充分酝酿一番。首次下手的知青往往会有片刻思想斗争的过程，及至观念转变了，就开始留心观察，选择适当下手对象（当然最好是平常对知青吹毛求疵的，但容易得手仍然是一个主要因素），然后再耐心等待最佳时机（譬如某个月黑风高夜）。“跳舞”的时候一定要干净利落，不要弄出任何声响，“跳”完之后，还要将“战利品”迅速解决掉。

“跳舞”的结果往往是一只鸡连毛还没拔干净，就和着水和盐一起下锅了。尽管如此仓促、简陋，几个月没见油星的知青们还是连筷子也等不及用，便将无辜的大公鸡酣畅淋漓地啃食净尽的。

然而，日子再艰难，也有极少数不“跳丰收舞”的。他们是信守“志士不饮盗泉之水”的原则，宁可到书本里寻求精神食粮，因沉迷于某种事物，常常苦思冥想数天而忘记了吃饭。其结果，这些人在饱读了几箱子诗书或精通了某项学问的同时，练就了一副如骆驼般能伸能缩的橡皮肠胃。

除此之外，天上偶尔也会掉馅饼，那就要看当地农民的饮食习惯而定了。农民们大半不吃死物，如摔死的牛和因不能下小崽而被杀死的老母猪等，他们觉得如果吃了，不遭殃也要闹个不吉利。

知青们舍不得让大好的牛肉全部喂野兽，就集体向村长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请。迫于无奈，村长只好郑重声明：吃了以后，一切后果自负。如有不测，与队里无关。

知青独享了美味之后，就一夜间变成了“祥林嫂”：进进出出总会遇上陌生而惊惧的眼光，小孩子也被大人喝止住，不敢再同他们玩耍。

眼看着“祥林嫂”们依然故我地生活了两个多月，农民们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一年以后，正值青黄不接之际，一头小牛犊摔死了。知青们

高兴得手舞足蹈，早早便洗净了砂锅、备好了老姜和花椒。可惜，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终没有螃蟹吃。村上议过了，今年摔死的牛要全队分着吃。分而食之的结果，是知青们每人分得了一份拇指大的牛舌头。

转眼到了 1998 年，已是“上山下乡”运动 30 周年。对于那场现代史上十分罕见的城乡人口大迁徙（不是今天的民工进城，而是城镇读书人下乡），简单地问一声“有这个必要吗”未免轻浮。毕竟那是一段蘸着一代人热血写就的历史！作为后人，我们只能遥寄一种深深的敬意。那一代知青被命运牵引到落后的乡村后没有沉沦，除了为农民送去科学技术的恩惠，更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开始了对自身命运和民族命运的严肃思考。这种思考最终变成在地下流传的手抄本“知青小说”，变成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上的诗词，变成“文革”后的“伤痕小说”，变成思想解放的急先锋。那一代知青奇迹般地重返主流社会，今天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这足以让我们今天的“小王子”、“小公主”顶礼膜拜。我们这套书设置“挫折教育系列”，知青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愈挫愈奋的人格典范。

闯关东

关内关外的故事（一）

东北最早是女真人的天下。一个整日价游来荡去的民族生产力自然也就不那么发达，人口自然也就不那么兴旺。这件事是努尔哈赤老先生常常引以为恨的。于是，他开始大力推行“恩养”汉人的政策：给他们房子、田地，还不让女真人欺负他们。可还没等汉人欢天喜地做够黄粱美梦，又出现了烧杀抢掠。

悻悻然的汉人决定一走了之。也许孙悟空就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大批大批企图逃入关内的汉人非但没有走成，反而被努尔哈赤老先生迁到了更为遥远的地方。汉人与满族人也就是女真人第一个回合的争斗就这样以汉人的失败而告终。

汉人与满族人关于关内关外的第二次争斗，起因与第一次极其相仿。只不过争斗的时间持续了足足有二百多年。

满族人在忙着完成一统中国的霸业时，使自己那块“祖宗地”大受冷落。及至满族人大举入关，“祖宗地”则倍显荒芜。为此，满族人执政后，特地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例》，奖励汉人向东北移垦，以恢复“祖宗地”的繁荣昌盛。

关内的汉人此时正饱受满族人大肆圈占土地之苦。满族人认为，“满汉杂错易生争端”，于是无论有主无主的田地，“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于是，整村整屯的农民被逐出家园，成为无田无家的流民。一时间，母子流离，哭声遍野。

《开垦例》的颁布对汉人流民来讲无异于一道眩目的曙光。大家“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成群结队奔往辽东。在那里，人们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以外，还可以采参、狩猎、伐木或者淘金。虽然辛苦，但尚可活命。于是乎，东北成了汉人流民流连忘返的乐园。

历史就是这般相似，世事也就是这样弄人。《开垦例》实行了23年以后，虽然关内的生活仍然是那么没着没落，可满族人的政策却已经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硬说若是在这块“祖宗地”上与汉人杂居共处，民风就不淳朴了，语言和其引以为荣的骑射术也就不那么精纯了。所以，只有封禁。

事实上，根本原因在于，流民入关以后不仅开发了足够的荒地，而且动摇了东北旗人赖以生存的根基——采参业。关外人民聚积日多，物价日日看涨，不免于旗人生计有碍，于是，只好封禁了之。然而，这一次，汉人并没有乖乖就范。关口稽查严密，他们就从海上乘船而北。大路上设卡盘察，他们就披荆斩棘、翻山越岭。背上背着行李，手里拿着自卫用的木棒，夜晚以树为屋，拢火以防野兽。葬身虎口、鱼腹者有之，坠岩谷丧生者有之。可是没有什么能够扑灭汉人流民心里那团谋求生存的希望之火，于是“闯关东”一词就产生了。这一闯，闯了整整二百多年。

230年以后（又是一个历史的巧合），满族人的龙椅岌岌可危，再也顾不上什么民风啦、淳朴啦一类的事情，东北地区开始全部开禁。这一回是汉人取得了胜利。

关内关外的故事（二）

到了民国，满族人下台了，而汉人流民闯关东的步伐却并未因此而终止。从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前后 20 余年光景，东北地区的人口比清末增加了一倍还多。

此时的闯关者尽管已是鸟枪换炮——封禁取消了，人们可以自在地往来于关内关外。不仅有船可乘而且有火车可坐。只不过，这“闯”字不是那“闯”字。此时的“闯”较之于前清为了逃避关卡阻拦、偷渡过关带有一定冒险性的“闯”，又别有一番辛酸。

民国 12 年到民国 19 年，关内山东、河南等北方诸省连年遭灾。7 年间不仅年年颗粒无收，而且战事连连。走投无路的人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了关外。父母巴望着给幼儿弱女吃顿温饱饭、找件暖和衣服穿，青壮年巴望着给日渐年迈的父母颐养天年，好好地养老送终。三四百万人就这么怀揣着希望辞别了故土，一家人一家人地上路了。

有了舟车自然便利，但也不是自坐的。旅费少的，“在船则坐于甲板之上，在车则乘特备之货车”。身无分文的，就一路乞食而行。沿途冻饿而死者不在少数。到了奉天（沈阳），大家的窘迫趋于一致，连相互帮衬一把的可能也没有了。

原本是不忍心让孩子挨饿受冻才痛下决心远走关外的父母，此时就只剩下卖儿卖女这一条路。太小的狠不下心，太大的没人要，前思后想，只有把那不大不小的孩子牺牲掉，才能换来全家人的几顿饱饭、一份盘缠。于是，女孩子送人做了童养媳，男孩子送人做了牧羊倌。

此时的关外也已不是彼时的关外。经过这么多年，能开垦的荒地已经开垦得差不多了，再想作自耕小农是万万不可能的。于是女的为人作老妈子，缝缝补补、忙前忙后，男的为人伐木、钻矿井，没日没夜的只为到年底能多挣几个工钱。

春去秋来，伤的伤了，亡的亡了，余下的坐下来静心一想，忽然发现一个家与其这样各自漂泊、相互分离着不成其为一个家，远不如返回关内，大家厮守在一起苦挨苦熬。于是，一年来的辛苦血泪就只折换成一张小小的返程车票。

一家人坐在驶向关内的火车上，心有余悸地享受着重新相聚的喜悦，衰弱的心里重新燃起了一小簇希望之火。与他们擦肩而过的火车上，此时正满载了无数怀揣憧憬的闯关者。

来来去去，春夏秋冬，关内关外的故事就这样一直演绎着，直到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人全面占领东三省。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东北在近代异军突起，成为重要的粮食基地和新兴工业基地，是我们的先民辛勤开发的结果。谁说中华民族是因循守旧的民族？在生存危机面前，我们从来就有冲决网罗的勇气和拨云见日的创造力。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直到今天的“洋插队”、“全球大串连”，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敢于并善于开拓生活的新天地。

下南洋

出差到印度办事，回国时顺便到泰国游览一下。一进泰国，感觉真是轻松。走到哪儿都可以讲中文，简直就好像是在国内的某个大城市里一样。不像在印度，把自己弄得跟个假洋鬼子似的，搞不好还会有美丽聪明的印度儿童非常有礼貌地对你讲“莎扬娜拉”（日语：再见）。

当然也不能得意得过了头。有一次，我很自然地用中文问酒店的一位小姐从哪儿可以找到服务生帮我拎箱子，得到的却是一脸惘然。直到一位先生拎着我的皮箱走了好一段路，我才如梦方醒：原来那小姐是泰国人，我应该讲英语才对。这里毕竟还是人家的国家嘛。

不过，无论是从人口上、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华侨确实颇领风骚。事实上，不独泰国如此，东南亚各国凡是华侨聚集的地方几乎都相仿。细细查询起来，泰国大部分人的祖先都是华人。到大商店里买东西，正当你惊诧于售货小姐中文水平之高时，她会给你一个羞涩而亲切的微笑，告诉你她的祖父或曾祖也是中国人。

据导游（也是华裔）讲，华人进入东南亚地区后，因为理财有道，加之勤劳勇敢，很早就成了当地“先富裕起来的一小部分人”，不过社会地位仍很低下。后来，经过华人商会常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华人先是可以与当地百姓通婚，而后又进入政治舞台，取得了与本国公民享受同等待遇的权力。

看着路边不时闪现的为大选而作的宣传画像，看着里面那几张骄傲的华人脸庞，不由得想知道他们从前的故事。

明清以前，东南亚地区地广人稀极易谋生。不少中国商人或政治流亡者到达那里以后便“乐不思蜀”，成了东南亚的首批“淘金者”。明末清初，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沿海地区“有可耕之人，无可耕之地”。众多的农民沦为佃农，劳累一年下来，结果往往是“比及收获，折算殆尽”。为谋生路，他们只好抛弃“父母在，不远游”的做人原则，忍辱负重奔向南洋。

遗憾的是，由于英、葡等殖民者的入侵，这些拓荒人再也看不到半点金光闪烁了。到了晚清，整船整船的“猪仔”、“苦力”不停地运往南洋，华人在东南亚地区的生活境况可谓是一回比一回更跌向深谷。

一代又一代华人用自己的汗水和聪明才智造就了东南亚地区的兴盛，这一点连殖民者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英国前海峡殖民地总督就曾讲过：“马来联邦之维持，专赖锡矿税收，但开始作锡矿工作者首推华人。”

一代又一代华人同时用汗水和聪明才智改变着自己的社会地位。无论是作小工，开小店，还是蹬三轮，他们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忍受着抛家舍业背井离乡的凄苦，承受着殖民者对华人的侮辱和欺凌。从烈日暴晒下的割胶工发展到拥有十数家工厂，从惨淡经营一家小小的咖啡店发展到控制整个巨大的财团……今日的泰国、马来、新加坡都可以算是实实在在的见证。

几百年前，“当中国拥有一切必要的东西——好船、火药和指南针，可用以取得对印度洋诸海控制的时候，突然，由于一些不知道的原因，中国人忽又掉头离开了这个海洋”（奥古斯特·图森）。西方人却趁机大肆东渐，将东南亚据而作为其殖民地。

中国人，不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而是让荒凉之中生出人烟，让不毛之地欣欣向荣。几百年后，当西方人带着自己的枪炮悄悄地退出了这片海洋时，中国人却凭着老祖宗留下来的法宝——隐忍、坚韧、智慧——默默地在这诸

多海岛上创下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或许，这便是“中华民族”的习惯定语——勤劳、勇敢、善良——的由来之一吧！

俄国十二月党人

难忘的人们

1825年12月14日是俄国最早的革命者在彼得堡枢密院广场上举事的日子。人们根据起义的月份，称这些革命者为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原本是俄罗斯帝国农奴制的受益者。他们是年轻的贵族，是沙皇制度的支柱，担任着沙皇政府各个行政机关和军队的领导职务，有着大好的前程。但是，他们认为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的农奴制度是可耻的，自己所享有的种种特权是一种罪孽。于是，他们挺身而出，为废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而斗争。

在十二月党人之前，“人们不相信可能爆发政治起义，不相信有人能手执武器，就在彼得堡的中心袭击庞然大物：皇帝的君主专制。过去人们知道的只是宫中发生的时而打死彼得时而打死保罗别人取而代之的事件”。但是这一回，这些英勇的十二月党人就在首都的广场上用鲜血对专制制度表示了庄严的抗议。

尽管沙皇尼古拉一世用霰弹镇压了起义，但是就在他得意洋洋之时，“却感到了令人寒颤的内心恐惧”，以致他在这样一句审讯记录下面打了12个惊叹号。

沙皇的报复是疯狂的。先是亲手御批的圣旨：上脚镣手铐，严加管制，与凶手等同。继而5位十二月党人被列为“特等”罪，判处绞刑。然后便是120多位十二月党人戴着沉重的镣铐，被流放遥远的西伯利亚服苦役。

在西伯利亚冰冷荒凉的大片土地上，野兽比人还要多。仅有的二三百户人家，夜晚睡觉前总是用大石头将门抵上，否则便会有大狗熊之类的食肉动物悄然光顾。十二月党人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或是服苦役或是服流刑，直到1856年。

在漫长的30年里，不断有人劳累而死，但是“在关键时刻，他们中无人会往后退”。服苦役者，有人密谋把狱吏关进牢房、放火烧毁监狱；有人通过给家里写信进行反政府宣传，咒骂专制制度、揭露其罪行。那时候，狱中十二月党人的书信在俄国各地被人们争相传抄。服流刑者，打猎、耕种，在偏僻荒凉、毫无生气的大草原上建起新的村庄。他们还兴办学校、开设图书馆、给当地人治病。在那里，“贱民们”和昔日的贵族老爷平起平坐，人人能吃饱，年年获丰收，到了年底，还可以为心爱的妻子置办上一件带着貂皮领的节日外套。

提起妻子，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她们没有听从尼古拉一世允许改嫁的谕令，也没有被用来拦阻她们的种种恫吓吓倒。她们宁愿放弃堆积如山的黄金，宁可在拿着武器的哥萨克卫兵的押送下被铁链捆锁着行走，也要到那苦寒的野兽出没的地方去，守在自己的丈夫身旁。义无反顾的妻子令铁石心肠的阻拦者也不由得泪雨滂沱。

30年中，她们虽然日渐憔悴，但始终是丈夫眼前那“眼睛里含着天使般温情的绝妙的美女”，是“神的安琪也许”，“那仁爱的妇女心灵”真的起了作用，曾经是达官显贵不谙劳作的娇小姐，在进入了该当祖母的年龄时，却成了西伯利亚土地上的一等劳力。她们可以持久地把握耕犁，还可以用锥子和麻绳在厚皮子上飞针走线。当然，还有不少人正当盛年便长眠在西伯利亚。

她们虽然不一定都能理解丈夫的政治理想，但她们对爱的执着，对苦难的超越，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感人肺腑的篇章之一。

30年以后，当十二月党人得到大赦，从西伯利亚的冰雪中回来时，他们再一次站在开明地主的营垒一边，而且，甚至“比迎接他们的在原地受到摧残和蹂躏的年轻人更富有朝气”。

妻子们

谁记起了那个命定的恶运，
谁就会知道，许多善良的妻子，
怎样跟着丈夫去他乡。

……

她们难忘的功绩是这样的崇高而神圣！
在苦难的日子里，
她们像一群守护神，
成了流犯们的可靠柱石。

……

又是新年之夜。此时该是贵族们大办舞会的时候了。宽敞华丽的大厅里必定又挤满了鲜花、缎带、羽饰、时装、妩媚多姿的少妇和风流倜傥的年轻爵爷，大家一定又都在熟练地舞着、玩着、欢闹着。

这个时候，在远离首都、远离喧嚣、冰冷荒寂的西伯利亚，几位昔日舞会中光彩照人的公爵夫人正在牢房里与她们心爱的丈夫厮守在一起。没有音乐，没有香槟，但是相亲相爱的人们在以自己的独特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丈夫拿出手铐铁链中的一只铁环戴在妻子已不再娇嫩的手腕上。妻子就将这只曾经印出自己亲吻的铁镯子当作珍宝珍藏一辈子。

这一年是“仁慈的君主”恩泽西伯利亚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们第一次获准摘下了身上的镣铐。

能够与丈夫和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牢房里相聚，对妻子们来说是梦想已久的事情。

沙皇的谕令、父亲的责骂、母亲的泪水以及襁褓中婴儿的啼哭，没有什么能够隔断公爵夫人对丈夫的思念。“西伯利亚是这样的远，西伯利亚是这样可怕，但人们仍然能生活在西伯利亚！”“我要去！我要去！我应该丈夫的身边死去！”“我不会在那可恨的狱里流出自己的眼泪——我要恢复他的骄傲、骄傲，我要给他以力气！”第一次学会思考的公爵夫人决定抛下双亲和幼儿，舍弃往日奢华悠闲的贵族生活，紧紧跟随丈夫，直到地老天荒。

丈夫苍白疲惫的面容召唤着她们，丈夫戴着镣铐、红肿的双手早已将她们的心带走了。

疾驰的马车上载着一颗焦灼的心，焦灼的心里是远方丈夫苍老的容颜。

此时此刻，妻子们坐在硬硬的床板上、冷冷的水泥地上，听卡挚雅用三种语言朗诵雷列耶夫的新作，听喀林娜绘声绘色地讲述在国外游历的趣事，怀着惊喜传看别斯图热夫素描画中的自己。窗外呼啸的寒风为她们奏响新年的音乐，野兽凄厉的哀号是她们的动人的新年钟声。妻子们为这一刻真心实意地对上帝充满了感激。

没有灯火辉煌的大厅，没有味美丰盛的佳肴，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带着

心满意足的叹息声欣慰地倚靠在亲爱的丈夫身旁。

囚徒们

每天，一群戴着重重手铐脚镣的囚徒，天不亮就坐到马车上。马车载着他们在黎明前的黑暗里行驶，将被寒冷和冰雪凝固住的空气划出一个大大的口子。囚徒们眉毛上、胡子上的小冰粒慢慢地越积越多，看上去个个都像圣诞老人爷爷。戴着镣铐的圣诞老人爷爷们尽管饥肠辘辘、衣衫褴褛，脸上还被打了烙印，却真的是笑逐颜开。他们相互取笑着、嬉闹着，笑骂声被西伯利亚特有的严寒冻结住，洒满了一路。

这些快乐的囚徒被当地人称作十二月党人。看着他们身形消瘦、面色苍白的模样，你很难把他们跟沙皇检阅台前，昂然马上、衣着华丽的近卫军官联系在一起，或许，除了他们眼中的骄傲和偶尔闪过的淡淡的忧伤。这些曾经是皇帝宠儿、曾经前途似锦的囚徒们，原本尽可以在自己的贵族庄园里无所事事，无偿享用农奴的劳动成果，接受他们小心翼翼地侍奉。或是与同样富有而貌美无双的妻子花前月下，或是在昼夜不停的豪华舞会上大显身手。然而，他们却偏偏与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沙皇制度、农奴制度作对，要消灭自己的特权。或许绞刑、流放、服苦役足以使年轻的贵族回心转意痛哭流涕懊悔不已了吧，可是不。偏就有人执迷不悟、死不悔改，即使在冰冷的牢房里，还要用戴着手铐的手写出这样的诗句：

纵使身陷囹圄，
我们也为镣铐，
为自己的命运而高傲。
我们将一如既往把沙皇嘲笑。
我们悲惨的工作不会就这样消亡：
从星星之火会发出熊熊的火光；
我们摆脱了愚昧的人民，
将在神圣的旗帜下聚集。

快乐的囚徒钻进西伯利亚矿坑的最底层，开始完成他们一天的“功课”：每人每天挖三普特矿石。

矿坑里潮湿阴冷。坑壁上到处是可怕的洞穴，仿佛矿山精灵张开的一张张血盆大口。泥土偶尔悉悉嗦嗦地从坑壁上剥落下来，砸进地上流淌着的水流里，令人随时想起“塌方”这个可怕的字眼。地面起伏不平，布满着大大小小的陷坑或土坡。劳动工具横七竖八地胡乱摆放在地上。

戴着镣铐的囚徒们有的挥着沉沉的铁锹铁锤，开采新矿，有的则挑着重重的担子，走过颤巍巍的横木，将矿石一担一担地运出去。

快乐的囚徒依然快乐。笑闹声、镣铐声、歌声、铁锤声不停地在西伯利亚的深渊里回响。囚徒们骄傲地对妻子们说：“看，劳动并不会杀死我们！”

囚徒们回到监牢里也是快乐的。在没有窗户的牢房里，他们是苦役犯，也是诗人和艺术家。他们不断地传看第一位勇敢妻子冒着风险带进来的普希金诗歌《致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看一遍激动一遍；他们激情满怀地笔耕不辍，写诗的写诗，写札记的写札记；有人爱唱歌、有人善作曲、还有人一声不响地画出了全体在押十二月党人的肖像……

快乐的囚徒也有不甚快乐的时候。当他们为终于倒下的朋友挖掘坟墓的

时候，他们仿佛也在为自己准备着后事。他们感觉上帝造就的美玉正在被岁月的风尘淹没光芒，渴望着重新燃起十二月的烈焰。

囚徒们快乐，是因为没有什么能够将他们打垮，他们纵然是死，也死得其所。囚徒们不快乐，是因为他们不能再一次拿起枪，把沙皇从他的宝座上赶下去。

享受过自由、也希望所有人都同样享有自由的囚徒们，一年一年地等待着……

写到这里，我想说，西伯利亚本与十二月党人无关！他们最让我感动的，是对民族前途的崇高责任感，是对民众疾苦的伟大同情心。他们用不可重复的青春乃至生命，去殉一个改革和现代化的理想。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在一个历史关头，不能光想着自我如何锦衣玉食，而应在民族大业中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吃喝玩乐，人毕竟只有一副器官，享受的乐趣其实是十分有限的；而当一个民族在现代化的山路上艰难地爬坡时，你挺身而出，猛推了一把。历史将记住你的这一贡献，你在这个星球上没有白来这一趟。

意大利烧炭党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纵观世界历史，好像再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统一史比意大利更加一波三折了。意大利从中世纪开始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才彻底完成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也许是那只大得出奇的皮靴子形状使它命中注定要过动荡不安的日子。意大利自从被搞得支离破碎邦国林立以后，邦国之间便争端四起、互不相让。意大利人民为反对外族压迫而建立起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烧炭党。第一批烧炭党温塔出现于 1807 年的意大利南部山区。这里的许多居民都是烧炭工人，他们把碳烧好后卖给小店铺——温塔。由此产生了烧炭党的名称。烧炭党崇尚自由、平等的学说，他们的党旗由分别象征着希望、美德和信仰的蓝、红、黑三色组成。

烧炭党产生的时候正赶上拿破仑在意大利当家。拿破仑把意大利当成自己最大的战争补给地，极尽搜刮之能事。除了巨额税款，意大利人民还要向拿破仑支付沉重的“血税”。1812 年远征俄国的几十万法军中，约有 3 万名意大利士兵。而后来有幸回到意大利的不超过 300 人。“整整一代意大利人牺牲在拿破仑的流血战争之中，却与意大利本身的利益丝毫无关”。

以赶走法国占领者、实现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为宗旨的烧炭党一经出现，不仅成员数量迅速增加，而且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他们到处暗杀法国官吏，袭击法军的营房和仓库，散发革命通告，组织武装起义，甚至在一些城市成立了临时政府。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烧炭党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再加上拿破仑在与欧洲反法联盟作战中的失败，意大利人民竟真的把这只昔日威风凛凛的吸血老虎送走了。

遗憾的是，烧炭党送走的是一只老虎，引来的却是一群豺狼。意大利又被肢解成 8 个邦国，其中有的邦国直接处于奥地利和西班牙统治之下。亚平宁半岛从此非但没有得到平静，反而“在梅特涅的压迫下辗转呻吟”起来。梅特涅是奥地利帝国的首相。他的侦探网渗透到上至各邦国的宫廷，下至居民点。侦探们出入咖啡馆、饭店等公共场所，刺探私人交往、关注街谈巷议。意大利人对奥地利的控制稍有不满意，就要遭到逮捕，甚至处死。

各邦国的统治者更是疯狂滥杀无辜以借机向梅特涅大肆献媚。号称“刽子手”的弗兰茨就曾把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监狱、绞死或枪杀。他属下的民众自然恨之入骨，于是有一天，在一座教堂的墙上出现了这样的题词：“君王，我对你的热爱之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使我抱有这样的幻想：但愿能亲眼见到你被从宝座上推下来而变为粪土”，落款是：“热爱意大利暴君弗兰茨一世的臣民”。

烧炭党再一次率先扛起了争取民族独立、实现祖国统一的旗帜，采取各种方式鼓励民众开展反奥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著名的经济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们都加入了反对奥地利妄图将意大利辖区日尔曼化的爱国主义运动。烧炭党人的地下刊物一直在秘密地传送着，落款为“热爱自己祖国的意大利人”的传单也一直在广为散发着。

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之后，烧炭党人先后两次在各个邦国重燃起义烽火。他们曾迫使各公国的大公退位的退位、避难的

避难，还迫使那不勒斯王国的监国及其一家都穿上了饰有烧炭党三色图案的衣服来参加革命胜利庆典。但由于烧炭党自身存在的缺陷，起义最终还是被奥军镇压了。

烧炭党存在了三十几年，奋斗了三十几年。烧炭党人饱尝了成功与失败的甘苦，虽然没能完成自己的理想，但他们多次的发难起事带动了整整一代人。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枪杀了。但正如一位临刑的神职人员所预言的“你的日子会更糟”一样，30多年之后，封建邦主下台了，入侵者夹着尾巴逃跑了，意大利终于统一了。

穿丧服的热恋者

丧服似乎很难与热恋联系起来，但是有一个深深爱着自己祖国的人，却终日为了她而身穿丧服。他就是意大利的朱泽培·马志尼，一位著名的民主派革命领袖。

1821年，一个春风和煦的上午，少年马志尼正陪着母亲在热那亚郊外的海滩上散步。忽然，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快步向他们走来。这个人衣衫褴褛，面色黑黄，但眉宇间焕发着勃勃英气。他来到母子跟前，行过礼后请求施舍。母亲打量着这个人，眼里慢慢涌上了泪水，掏出钱来放到他双手捧着的破帽子里。看着大惑不解的马志尼，母亲告诉他：这是一位烧炭党人，为了救国救民而不惜抛家舍业，今日沦落至此，见到的人理应尽力相助。这件事对少年马志尼触动很大，对他日后立志献身救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马志尼成长的年代，正是意大利在奥地利的压迫下辗转呻吟之时。亲眼目睹祖国支离破碎的惨状，本应是无忧无虑快乐逍遥的大学生活在那里消失了。即使是在众人的欢乐气氛里，马志尼也总是高兴不起来。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穿上了那身深黑色的丧服，以时刻提醒自己祖国正在遭受着沦亡的耻辱。

马志尼在烧炭党人起义屡遭失败、处境危险之际加入了烧炭党。3年以后，因叛徒告密，他被逮捕并被逐出意大利。流亡马赛期间，马志尼思索着烧炭党屡次起义失败的原因，下决心要将它改造一番。他不停地在意大利侨民中开展工作，很快就以其远见卓识深受侨民的爱戴。暗探在描述马志尼时说：“一个比其他任何人都勇敢而危险的人物。他不仅立志要复兴意大利，而且准备克服一切障碍，牺牲一切甚至生命，只要这样做有利于意大利。”

1834年，马志尼领导的“青年意大利党”起义也告失败。在以后的几年里，他辗转流亡国外。在瑞士，为了躲避侦探追踪，他深居简出，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就着昏暗的灯光不停地从事宣传写作，谋划方略。在伦敦，他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常常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怀表、外套、皮靴，能当的都当掉了，但还远不足以使他摆脱困境。

虽然困顿如此，“衣带渐宽终不悔”的马志尼仍然一心扑在他的救国大业上，夜以继日地回忆着、思考着。1839年经过深思熟虑的马志尼终于再一次开始为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奔走呼号。

尽管马志尼领导的武装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足以把奥地利统治者搞得寝食不安。梅特涅在其回忆录中慨然承认道：我和最伟大的兵作过战，我曾经做到了使皇帝和国王、沙皇和苏丹、君主国和共和国走向妥协，我足有20次卷入和解开了宫廷叛乱的乱丝，可是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比这个意

大利强盗更使我操心。他瘦削个儿，面容惨白，全身衣服褴褛，但雄辩滔滔如狂风急雨，热情燃烧如宗教使徒，狡猾如窃贼，轻快如喜剧演员，不倦不休像正在热恋的人——他的名字便是朱泽培·马志尼。

梁启超先生一句公允的话大概也足以告慰这位将丧服一直穿到老的热恋者了：论意大利建国之功，首必推马志尼，天下之公论也。

中国抗日战争

请教我们打仗

埃德加·斯诺曾经以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受了欺辱的农民，惯常只会抱着脑袋、蹲到地上默默地流泪，或是解下腰带（因为他们家里穷得连根绳子也没有）自尽了事。不要说敢于“打进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的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宴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就是发句牢骚也要躲着地主的狗腿子远远的。

然而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中国农民确实沉默得太久了，但是当日寇的铁蹄踏进中国贫瘠的崇山峻岭的时候，中国的农民觉醒了。

他们不再眼看着日寇要钱、抢粮、捉鸡、抓人，他们要起来抵抗。曾经有一位农民，在亲眼目睹全村父老乡亲全部被日寇惨酷地杀害后，偷偷跑到八路军驻地，要来了5颗手榴弹。回到家乡，这位农民假装为鬼子带路，借机将鬼子的一小队人马炸得死的死、逃的逃。喜上眉梢的农民，带着从鬼子身上找到的4000元钱和所有武器，参加了八路军。

还有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因为地处偏远，所以一时尚未受到战争的蹂躏。但当村民从路过的八路军那里听来有关日军的种种暴行之后，经过一夜思考，村长——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这样对八路军说：“我们这一带山谷需要一支自卫队，请八路军帮助我们。希望你们能派人来教我们怎样打仗。”

而在一个频频遭到日寇骚扰的村子里，村民们早在听说有八路军之前，就开始进行“自卫反击战”了。那时候，他们用的是一种叫做“火铳”的土制火枪，一次只能打一枪。后来，他们知道邻县的八路军可以帮助训练民兵。因为害怕被抓去做壮丁，开始他们只试探着送了一小部分人去学。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多，学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村民们不仅学会了射击、投手榴弹，还学会了如何从敌人手里抢枪。

摆脱了屈服性格的农民，一旦站立起来，就变得不可阻挡。健壮的体格给了他们无穷的精力，古老的富有战斗精神的传统给了他们层出不穷的智慧。

村民中有创造性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先后发明了令鬼子闻之丧胆的地道战和地雷战。在冀中平原，家与家之间、村与村之间，地道纵横交错，百姓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全部可以藏在里面。农民们可以自由进出，随时打击来犯的敌人，而敌人却只能望“洞”兴叹，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农民无计可施。

更使日军挠头的是地雷战。一位最早发明了土地雷、人称“铁瓜王”的农民曾经研制了一种“连环雷”，他的最高记录是一个晚上用18个雷炸死40个日本兵。无所不在的地雷不仅使日军死伤惨重，而且令日本兵提心吊胆，整日惶恐不安。他们甚至宣布要以牺牲100个“皇军”的代价，来活捉农民中的爆炸大王。然而，此时的爆炸大王，早已像边区儿童所唱的那样“变成千百万”了。

“贼心不死”的日寇当然不肯就此罢手。他们从老人、孩子和妇女身上下手，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施展种种伎俩企图摧毁农村中的抵抗力量。然而，受尽屈辱的农民，一旦觉醒过来，拿起了武器，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将他们打倒了。

朝圣者

圣地麦加，是每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衷心向往的地方。一旦有可能，他们便会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地到麦加去朝圣。在中国，也曾经有过这样一股朝圣的浪潮。朝圣人数之多，是那些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因而纷纷前来布道的传教士们所始料不及的。前去“朝圣”的人虽然用不着一步一个五体投地的长跪，却要冒着极大的风险，有时还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块如此吸引人的圣地，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

大多数朝圣者是年轻的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背景。一位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学生，她父亲的土地骑着马走几天也走不到尽头。她自己从小就被家里人心肝宝贝一样捧在手心里。但抗日战争爆发了，她成了一名最坚定的政治朝圣者。

国难当头之际，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没有冲上战场去与敌人拼刺刀，反而迫不及待地到圣地朝圣，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怯于扛枪打仗，而是因为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弄到枪。

卢沟桥事变之后，国民政府里依旧是旧官僚、旧官员，什么也没有改变。满怀热情志愿参战却报国无门的学生在四处碰壁之后，将目光转向了偏远的革命圣地延安。“延安的首长们有极为丰富的政治经验”，“我们能够从八路军那里学会更多的东西，找一些真正对抗战有用的事去做”。这是他们经过对比与思考得出的结论。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和民主启蒙运动，而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就是这场运动的大脑中枢和中流砥柱。

年轻的政治朝圣者们背着背包，从不同的角落出发，辗转奔向延安。在他们看来，这是投入抗日战争的第一步。对“圣地”的艰苦生活有着足够思想准备的朝圣者们，希望自己的体魄能够像自己的头脑一样，训练有素。为此，他们把长途跋涉当作锻炼自己的一个大好时机。女孩子们也跟男孩子一样，穿着运动裤、工作服，背着行李卷，行走在赶赴“圣地”的人流之中。

事实上，能够安全抵达延安的朝圣者是足够幸运的。还有很多人，或是刚刚走出家门，或是几经周折，在坐过了各种各样的大破车之后，便被日本兵或伪军押送着，不知送到了哪里。

朝圣的道路是危险而艰辛的。但每天仍有无数熟悉了安逸生活的学生们、青年们，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坚定不移地朝着革命圣地走去。

抗战期间，延安“大学”先后向各抗日战场输送了3000多名“毕业生”。

反戈一击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是举世皆知的。日本士兵在与敌手对峙时，宁可自刎或是被同伴杀死，也绝不会放弃手中的刀而做对手的俘虏。能够让他们放下武器，悔过自新，继而反戈一击的敌手，大概只有中国的八路军。

一位曾经是关东军上尉的战俘，被俘时没来得及举刀自戕，被俘之后，不说话也不吃东西，想方设法就是要自杀。八路军敌工部的战士为了挽救他的生命，不知费了多少口舌。终于有一天，这位战俘开口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陆军省的政策对日本没有好处，我们只能希望国际上采取某种措施，在我们的国家遭到不幸之前阻止陆军将领们的行动。”

“敌工部”是由一些会讲日语的学生和政工人员组成的一个特别宣传机构，同时也是八路军“优待俘虏”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单位。在敌工部里，日本战俘可以自由地做大米饭吃，还有足够的香烟抽。而当时很多八路军战士都几个月没见过大米的影子、也没闻过香烟的“香”味了，这些俘虏大概可以算是八路军队伍中的贵族了。

俘虏和敌工部的战士一样，借住在老乡的农舍里。战俘之间可以自由交谈，他们作为护身符随身携带的诸如小盒、小包、小像章等七零八碎的小玩意儿，也都被敌工部的同志很好地看管着。

对这些枪杀我无辜儿童、强暴我母亲姐妹的异族竟能如此善待，大概除了因为这是一条铁的纪律外，中国人的宽容、慈爱与清晰的头脑、高度的是非分辨能力起了主要的作用。“俘虏一旦被解除了武装，就不应当用任何方法去侮辱和虐待他们”，和不仅杀害中国战俘而且连被八路军放回去的日本战俘也要杀掉的日本军队有天壤之别，这是中国八路军所信奉的“人道主义精神”。

由于日本人那特有的传统和日军的纪律，战争初期，日本兵一向顽抗到底，即使负伤也绝不投降。有鉴于此，八路军政治部用日文赶写了许多准备在日军中散发的宣传材料和口号，又教给战士们一些简单的日语和日本歌曲，以此进行短兵相接的政治宣传，向他们揭露侵略战争的滔天罪恶和失道寡助，宣传国际反法西斯运动风卷残云的大势所趋，解释八路军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政策。

战事再起，惯常负隅顽抗的日本兵也学会了装腔作势，胡乱地放上两枪就跑到他们的八路军兄弟那里做俘虏去了。有一位战俘甚至还在山西的群众集会上，公开发表了反对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讲话。

到了战争后期，在中国北方，就已经有不少八路军的旧敌新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游击队一起并肩作战了。

“1500年前，中国用书籍征服了日本”，在现代，“日本却回敬以坦克和大炮”。但最终，中国人民以他们的宽容大度，使日本自惭形秽。

窑洞烛光

烛光，一个多么温馨而浪漫的字眼。大酒店里的烛光餐厅、小巷深处的烛光酒吧，还有那烛光茶座、烛光舞会，说起来无不令人怦然心动。

然而，当烛光用以看书、写字，用来照明时，恐怕就没有那么浪漫了。在延安的窑洞里，人们所使用的就是蜡烛这种“灯”，它发出的光微弱到只能使人在房间里不致摔倒。同时，摇曳的烛光还会把一些奇形怪状的影子投射到房顶上或是墙壁上。不过，原始简陋并没有减少烛光温馨的一面。

在冬季，当人们从寒冷的旷野里回到窑洞，点上一只小小的蜡烛，就着红红的炭火盆，伴着红黄的烛光读书、学习，是多么的惬意。在夜晚，当人们半夜醒来，看到远处一弯新月下，毛泽东窑洞里那彻夜不熄的烛光和映在墙上的高大身影，心里又是多么的温暖。

在延安，和烛光一样原始却让人倍感亲切的还有窑洞。当八路军进驻延安时，那里除了一座孤伶伶的宝塔，所有其他的建筑都已被炸成了一堆堆瓦砾。八路军就在山崖的黄土中自己挖窑洞，并住了进去，就像世代代在那里居住的当地农民一样。

山崖干燥坚实，很容易打成窑洞。再加上几根木条、一些纸张和少量的白粉，就是一所简朴而整洁的住房了。木条用来做门窗框，打成木格栅，糊上白纸，一样干净漂亮。白粉则用来粉刷房内的墙壁。窑洞的地面一律是硬土地，窑洞内的陈设也全部是统一规格的：一张土炕，一张写字台，两个凳子，还有一个放脸盆用的小木头架子。只有毛泽东的稍有例外，他比人家多了一张帆布靠椅，这是他自内战结束以来唯一的一件奢侈品。

窑洞虽然原始简单，但住在里面的人都对它充满感情，夸它冬暖夏凉。在冬天，即使大风将纸糊的窗户吹出好几个洞，冷风一个劲儿地从窟窿外往里灌，他们也会解释说：这样可以有点风，我们喜欢亮光和新鲜空气。然后还会为自己多烧了木炭而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农民买不起木炭，是靠烧野草来取暖的。“我们的生活水平比起农民来仍要高一些”，这是延安战士和大小知识分子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住在窑洞里面的人，一走出窑洞，头上就是广袤的天空，就可以感受到每一次落雨、每一次降雪、每一次月亮的阴晴圆缺。走进窑洞，眼前就是一团柔和的烛光和一片宁静的空间。在这里，没有战争引起的惶恐和不安。窑洞烛光是家的感觉、家的温馨。而住在这个家里的人们，每天都在为保卫自己的家园、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家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以色列

历史的回顾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流亡中如此顽强地维护自己民族和宗教的特性，从中汲取力量并重新站起来。散居异乡仍能忠于自己民族的这种非凡力量是犹太民族所独具的。这正是犹太民族无与伦比之处。”

——比加·埃尔班

从约旦延伸到地中海的一片土地，就是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所得到的“上帝应许之地”——迦南。历史学家称这个地方为肥沃的新月。这里到处是沙丘和岩石，只是偶尔有一些零星的绿洲点缀其间，看上去似乎与“肥沃”无缘。然而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却使它吸引了无数来自西方和东方的虎视眈眈的眼睛。

犹太人就是在这样一块群雄环伺的贫穷土地上几进几出的。

亚伯拉罕出生在富饶的美索不达米亚，他带领族人来到迦南，开始了只有靠四处流浪才能生存下去的生活。他被后人尊奉为对上帝意志极端虔诚恭顺、与人交往仁慈亲切的典范。

第二位率领犹太人来到迦南的是摩西，摩西出生在埃及。远在他出世之前，生活在迦南的犹太人由于罕见而持久的饥荒，被迫迁徙到埃及的歌珊。他们很快在那里适应下来，并开始与异族通婚。

摩西出生的时候，时世已经起了变化。一位专横的法老剥夺了犹太人自由生活的权利，将他们贬为奴隶，令他们整日为城市建设服劳役。生在埃及、长在埃及的摩西无法忍受异族强加在犹太人身上的侮辱。他秘密地启发人们回想祖先半游牧式生活的自由和独立，并终于成功地率领着犹太人离开出生地，越过红海、穿过沙漠，经过40年的跋涉返回迦南。没有人曾经见过这块“上帝应许之地”，但这里是他们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地方。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先知告诫犹太人不要丧失独立或抛弃其信仰时，他们总会回忆迁出埃及这段历史。

迁出埃及不仅奠定了犹太人民族和宗教的独立，而且被许多其它国家看作是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标志。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中的民众领袖自命为新“迦南”的继承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在讨论美国未来美利坚合众国国徽时，曾建议将犹太子孙越过红海、向自由进军的行为作为美国国玺，并写上：“反抗暴君就是服从上帝”；而亨利·乔治则写道：“在笨重的人头狮身石像的前爪之间树立着人类自由的维护神。迁出埃及的号角挑战性地宣布了人类的权利”。

犹太人又一次回到迦南是一千年以后的事了。在这一千年的时间里，犹太民族经历了历史上最伟大最辉煌的日子，也走过了一大批一大批被掳为奴的悲惨历程。

犹太人打败腓力斯人，建立了大卫王国，并于公元前1006年征服耶路撒冷。自此之后，大卫王将他的版图从红海一直扩大到幼发拉底河。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继承王位以后，建成了一向令大卫心驰神往的圣殿。再以后，就是犹太人被巴比伦人掳走、流放的日子。

圣殿变成了一片瓦砾，盛极一时的耶路撒冷鲜见人烟。王国的生命力从此消失了。

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得益于宽容的波斯王居鲁士。在流放期间，节俭而富有创造性的犹太人很快就使自己的生活水平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然而，令这些显然已经失却了上帝恩宠的人们始终念念不忘的，还是那块圣地、那座圣殿。犹太人的执拗深深打动了波斯王居鲁士。于是，居鲁士在吞并耶路撒冷之后，立即下诏书号召犹太人重返圣地、重建圣殿。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像他们的先贤亚伯拉罕一样，为了上帝的呼唤，放弃了富足的生活，回到满目疮痍的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款待远来游子的不再是奶和蜜。重建圣殿的艰辛人们始料不及。20年之后方始建成的圣殿远不如所罗门时的华丽壮观，然而人们有理由说：“新圣殿的荣誉必大过于先前的圣殿”。

犹太人第四次来到这片“上帝应许之地”的时候，已经是公元一八八几年了。公元70年罗马人摧毁了犹太人的第二座圣殿，同时也彻底摧毁了犹太民族的独立。在这以后将近二千年的漫长岁月里，犹太人始终是世界里的流浪者。宽容使他们流入，迫害使他们大量涌出。犹太人的足迹遍布陆地和海洋。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地方。但是，耶路撒冷始终是“这个被驱散的民族的中心”。在那里，他们的生活并非没有苦难，但至少，他们是自己的主人。

从第一批现代犹太人返回这片“上帝应许之地”起，到大卫·本·古里安向世人郑重宣读犹太人独立宣言，整整用去了66年的时间。66年以后，犹太人拾起了丧失已久的尊严，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

在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了一扇永远向犹太人敞开的大门。犹太人也终于为自己漂泊不定的灵魂找到了归宿。

印度

通向自由之路——纺车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 1920 年时，印度，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国家已经被英国统治了整整 72 年。72 年对这个伟大的国家来说，是走向贫穷与堕落的年代，是尊严消失殆尽而饥馑与仇杀此起彼伏的年代。

一个伟大的国家“竟让一个远方小岛把它的手足捆绑起来，任意支配”，这确实“是一桩荒谬绝伦的事情”。其荒谬在于印度圣雄甘地所说的一句话：“如果我们全体印度人同时吐痰，那么唾液可形成一泓潭水，足以淹没 30 万英国人。”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英国人被唾液淹死。他们仍然是印度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如果印度人要同英国人讲话，他们必须恭顺地垂下目光，以免显示出对白人的不敬；如果印度人要乘火车，他们必须把自己塞进已经爆满、充满汗臭的肮脏的车厢，而把干净宽敞的车厢留给英国人专坐。

注重卫生的圣雄最终并没有使用“唾液”这个武器。不过他的武器同样绝妙，而且有效——世代祖辈相传的木制纺车。

“英国人妄图迫使我们到机枪阵地与他们较量，因为他们手里有武器而我们却没有。我们击败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把决斗引到我们有武器而他们却没有武器的地方。”1920 年 8 月 1 日，圣雄甘地发动了他的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运动的根本目标是以木制纺车破坏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大厦，摧毁其政权基础——经济。

以圣雄为灵魂和引路人的国大党随即通过下列决议：享有英皇授予爵位者放弃爵位；抵制英国公立或公助学校、英国法庭和英国货；抗拒不公平法律；自愿不加抵抗地去坐牢。

数以千计的印度人响应了国大党的号召，数以千计的人自觉自愿地走进了牢房。面对此情此景，省督们惊惶失措、一筹莫展，大声惊呼：“这是世界史上规模空前的创举，它几乎达到预期的目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纺线成了国大党各个阶层成员中一件庄严的圣事。即使身陷囹圄，他们也不会忘记随身携带上一架木制纺车。后来成为印度女首相的英迪拉·甘地结婚时所穿的婚纱就是用其父尼赫鲁在狱中纺出的棉线制成的。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圣雄放弃了所有其他的衣服，日复一日地身缠土布“拖地”——一种手工纺织制造的缠腰布和披肩，并且坚持每日纺线半小时。

嗡嗡的纺线声中，昂贵的西装、精致的帽子、手套以及其他所有的舶来品全部堆成了一座座小山，在熊熊的篝火中付之一炬。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人人都披上了自制的白色棉布。虽然粗糙得会把皮肤磨得又红又痛，但是人人变得兴高采烈。颜色浅淡的土布衣服，“就像褐色的军服把欧洲独裁者的军队联系在一起一样”，从此牢固地将印度人民团结了起来。

嗡嗡的纺车，唤醒了久已麻木的民众，唤起了对自由与独立的无限追求。它就这样一直嗡嗡响着，直到 27 年以后将英国人轰出了印度半岛，使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变得“从此微不足道，黯然失色”。

通向自由之路——监狱

印度通向自由的道路似乎变得越来越奇怪了。不过，他们的圣雄甘地确曾这样写道：“自由往往必须到牢房里去寻找，有时甚至到断头台上去寻找。在议会里、法庭上或者学校里，人们永远得不到自由。”对于被大多数人视为畏途的监狱，英迪拉·甘地也曾这样说：“我决心已定，必须走向监狱”。而第二次被捕入狱的尼赫鲁则慷慨陈词道：为印度的自由而战无上光荣，对于一个印度人来说，没有比为事业而牺牲或完全实现美丽的梦想更好的了。

监狱里并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地面、墙壁，周围的一切都是泥土色的，就连换洗衣服也染上了这种色彩。透过铁栅栏向监狱里袭来的，是狂暴的风沙、雨季的暴雨和冬季的严寒。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带着足够的心理准备，不加抵抗地走进了监狱。一度生活极为欧化奢侈的尼赫鲁父子为了预先体验一下坐牢的滋味，甚至改用铁制餐具来吃饭，而且晚上还坚持睡在地板上。

圣雄甘地一生中在监狱里整整度过了6个春秋，总计2338天。他最后一次入狱已是73岁的高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从1921年至1945年，前后入狱9次，总共坐牢1041天。

长期的监禁生活非但没有使他们的意志被“怀柔”掉，反而成了他们斗争的新起点，反而使他们一次比一次更接近整个印度的独立和自由。

圣雄惯常以绝食相胁迫，说不清有多少次，他成功地从英国人的牢房步入到谈判大厅，与印度副王、与英王一起呷茶交谈，甚至向英国人、法国人、瑞士人以及意大利人发表蛊惑人心且颇具轰动效应的演讲：“我们为争取自由，选择了独一无二的途径……整个世界厌恶地看到鲜血流淌，它为此正在寻觅出路。我可以自信地说，唯有印度这块古老的土地，可以为渴望和平的世人指引道路”。英国首相丘吉尔雷霆震怒，脑海里闪现着圣雄身陷囹圄却手摇纺车、纺织不止的形象，拼命叫嚣：“翦除甘地，摧毁他所代表的一切”。

尼赫鲁在狱中一直笔耕不辍：20年代，《世界历史一瞥》结集出版；30年代完成《尼赫鲁自传》；1942年8月最后一次被捕时，写下了长达1000页手稿的著作《印度的发现》。在书中，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英迪拉也在监牢里找到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来做：照顾一位女政治犯的婴儿，帮助女政治犯学习，以便她获释后可以谋生。英迪拉还借机阅读了大量书籍，这些书对于她日后执掌印度不无裨益。

印度人没有让他们未来的首任总理失望。二战结束后，印度境内工人、农民运动此起彼伏。1947年8月15日零时，“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统治无可挽回地崩溃了”。

